

# 全球對話

## GLOBAL DIALOGUE

9.3

一年出版3期，以17種語言刊出

### 訪談 邰慶治

Christine Schickert

Brigitte Aulenbacher  
Andreas Novy  
Fred Block  
Margaret R. Somers  
Antonino Palumbo  
Alan Scott  
Gareth Dale  
Jonathan D. London  
Attila Melegh  
Chris Hann

### 巨變 75年後

### 紀念 Ann Barden Denis

Linda Christiansen-Ruffman  
Angela Miles  
Marilyn Porter

### 遷徙

Karin Scherschel  
Gerda Heck  
Carlos Sandoval  
Bediz Yilmaz  
Sarah Schilliger

### 理論視角

Julia Kaiser  
Jasper Stange

### 塞內加爾社會學

Moustapha Tamba  
Souleymane Gomis  
El Hadji Malick Sy Camara  
Samba Diouf  
Mouhamed Moustapha Dieye

### 開放論壇

> 讓女性權利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9卷 / 第3期 / 2019.12  
<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 主編的話

**全**球北方和南方最近在氣候變化和生態危機的辯論相當激烈。中國北京的比較政治學教授郇庆治是一位生態社會主義者，解釋了在中國的辯論，以及環境政策和環境保護的取徑如何在過去幾十年中有所變化。

Polanyi 的著作《巨變》於 1944 年出版，也成為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研究相關議題的濫觴。全球對話編輯團隊和 Polanyi 全球學會的會長 Andreas Novy 共同舉辦的第一屆研討會，慶祝著作問世 75 週年，Fred Block，Gareth Dale，Chris Hann，Margaret R. Somers 等研究 Polanyi 的學者對不同且廣泛的主題進行發揮與論述，反思《巨變》相關的知識背景，討論其觀點對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社會，政治發展有了一番精闢剖析。

Ann Barden Denis 於 2019 年 2 月過世，她是傑出的社會學家，且是 ISA 的活躍參與者，Linda Christiansen Ruffman，An-

gela Miles，Marilyn Porters 為文紀念這位學者。

第二部份由 Karin Scherschel 帶領彙整了移民問題的討論文章，雖說是有長遠歷史的主題，但是最近幾年重新浮上檯面，不同國家的作者探討其原因，難民的處境，爭議性的法律，還有公民社會。

面向未來的星期五聯盟是抵抗氣候變遷的社會運動組織之一，新生代年輕人不安地面臨著全球生態災難。Julia Kaiser 和 Jasper Stange 探討了跨階級的動員的取徑策略，可謂獨樹一格。

開放論壇的 Bengi Sullu 參加 ISA 的聯合國青年會議，向大家報告了出席的女性地位委員會第六十三屆會議的來龍去脈與精華。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的主編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來信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mailto: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 編輯團隊

**主編:**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 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編:** 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 Juan Lejárraga.

**編輯顧問:**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dji, Abdelhadi Al Halhouli, Saïda Zine.

**阿根廷:** Alejandra Otamendi, Juan Ignacio Piovani, Martín Di Marco,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uso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k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Md. Eunus Al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Lucas Amaral Oliveira,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l.

**印度:** 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Sandeep Meel.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a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Ehsan Pourejati.

**日本:** Satomi Yamamoto, Yuko Masui, Riho Tanaka, Marie Yamamoto, Shogo Ariyoshi, Kazuma Kawasaki, Sae Kodama, Koki Koyanagi, Tatsuhiro Ohata, Shunji Sugihara, Ryo Wakamatsu.

**哈薩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Aleksandra Biernacka, Iwona Bojadżijewa, Katarzyna Dębska, Monika Helak, Sara Herczyńska,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Adam Müller, Weronika Peek, Zofia Penza-Gabler, Jonathan Scovil, Marcjanna Szczepaniak, Agnieszka Szypulska, Aleksandra Wagner.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Luciana Anăstăsoaie, Cristian Chira, Alexandra-Ioana Dragomir,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Radu Mihai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Dan Gitman, Iulia Jugănar, Ioana Mălureanu, Bianca Mihăilă, Rareş-Mihai Muşat,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Alina Cristina Păun, Codruţ Pinzaru, Susana Maria Popa, Adriana Sohodoleanu, Gabriela Stoian, Maria Stoicescu, Maria-Cristina Titea, Carmen Eugenia Voinea.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Karl Polanyi 的巨著《巨變》於 1944 年出版，記載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歷史。這是一本對歷史和未來的剖析作品，環繞在資本主義何去何從的問題。這期我們慶祝這本開創性著作出版 75 週年，像是關於 Polanyi 作品的歷史，觀點，和方法。



遷移不是獨立的社會事件，而是社會，經濟，文化，社會等多重力量的交互作用結果，包括了權利，政治，民族國家，公民身份，全球化，和限制移民。本期文章融合了歷史去解釋移民原因，情況，聚焦在爭議性的政治法規，以及和公民社會的參與。



這期雜誌我們用社會學理論和經驗資料去解釋和分析賽內加爾學校制度，例如法阿拉伯私人學校和公立學校，還有和宗教的關係為何。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 > 談論社會學

生態社會主義：訪談訪談 鄒慶治  
Christine Schickert, 德國 5

### > 巨變(75 年後)

巨變75年  
Brigitte Aulenbacher, Andreas Novy, 奧地利 9

Polanyi的巨變75年  
Fred Block 和 Margaret R. Somers, 美國 11

市場作為國家統治技藝：Polanyi的觀點  
Antonino Palumbo, 義大利, Alan Scott, 澳大利亞 13

Polanyi，會計，超越GDP  
Gareth Dale, 英國 15

巨變：市場化東亞  
Jonathan D. London, 荷蘭 17

人口替代的恐懼  
Attila Melegh, 匈牙利 19

邁向民粹之路  
Chris Hann, 德國 21

Polanyi的遺產  
Andreas Novy, 奧地利 23

### > 紀念

紀念Ann Barden Denis  
Linda Christiansen-Ruffman, Angela Miles,  
Marilyn Porter, 加拿大 25

### > 遷徙

遷移，流動  
Karin Scherschel, 德國 27

想像的歐洲，現實的非洲  
Gerda Heck, 埃及 29

中美洲大逃亡：21世紀出埃及記  
Carlos Sandoval, 哥斯大黎加 31

難民作為不自由的勞動力：土耳其的啟示  
Bediz Yilmaz, 土耳其 33

團結城市的去邊界  
Sarah Schilliger, 瑞典 35

### > 理論視角

走向未來的學生：邁向生態階級政治  
Julia Kaiser 和 Jasper Stange, 德國 37

### > 塞內加爾社會學

塞內加爾宗教領導的社會人類學考察  
Moustapha Tamba, 塞內加爾 40

塞內加爾的世俗私人教育  
Souleymane Gomis, 塞內加爾 42

塞內加爾法語阿拉伯學校的策略轉型  
El Hadji Malick Sy Camara, 塞內加爾 44

塞內加爾教育系統的社會學考察  
Samba Diouf, 塞內加爾 46

塞內加爾的私辦天主教教育  
Mouhamed Moustapha Dieye, 塞內加爾 48

### > 開放論壇

讓女性權利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  
Bengi Sullu, 美國 50

「團結的口號動員了所有的城市居民，召喚了烏托邦的想像。烏托邦是有可能超克政治限制，透過將移民問題與社會政策問題聯繫起來，而非互向對立。」

Sarah Schilliger

# > 生態社會主義

## 訪談 郇慶治

郇慶治是中國北京大學比較政治學教授，也是 2002-3 的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院訪問學者；2005-6 年他他是德國曼海姆大學的洪堡研究員，研究聚焦在環境政治，歐洲政治，左翼政治。著述並編輯了許相關書籍，包括 2000 年出版的《歐洲綠黨比較研究》和《生態社會主義作為政治學》，2010 年出版的《重構現代文明的基礎》。

他接受了德國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的後成長社會研究小組行政小組長 Christine Schickert 的採訪，其同時是《全球對話》的助理編輯。



郇慶治。來源：FSU Jena.

CS： 在全球北方氣候變遷是人們喜愛談論的政治問題。可以請你已一下這個討論在當今中國政治和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呢？

郇：自從 1992 年在里約熱內盧會議的《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開始，全球氣候變遷就是全球環境政治的主要問題，至今已經有一段時間。中國就像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對於氣候變遷的立場相當明確與一致，就是「求同存義的責任原則」(CBDR)：這是什麼意思呢？首先，氣候變遷是人類社會的共同挑戰或危機，不僅僅影響已開發國家或發展中國家而已；再者，所謂的已開發國家像是歐盟和美國應該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或移

轉必要的資源和技術，負起歷史責任。最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應按照其經濟成長為全球氣候變遷的的解決貢獻心力。

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歷來來參與國際氣候變遷的政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92 年之前，1992-2012 年，2012 年至今。到 2012 年為止的主流共識是盟國家和美國這樣的已開發國家要採取比較多的行動。但是自 2012 年以來，中國政府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框架下已經逐漸聚焦在國際氣候變遷合作上。很好的例子是中國在《巴黎氣候公約》中的角色。

事實上中國立場轉的動力並不是奠

>>

基在《巴黎氣候公約》的簽署和執行，反而是源於國家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國家策略。簡言之，像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的宗旨之一就是現代化的「國家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這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首要目標之一，然後要積極地參加氣候變遷的國際合作項目，這象徵了政治上的理想性。例如，中國參與了2019-20年度的相關國際活動，越來越關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的實行。

CS：環境保護在中國早就不是新問題了。1972年，不像他社會主義政黨所領導國家，中國毅然參加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會議中決定許多環保原則。你能否描述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環境政策的發展和變化呢？

郇：說得好，中國的環境保護政策始於1972年中國代表團參加了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1973年中國於是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並成立了負責國家代表處專職處理這一個問題。從此中國的環境政策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1973-89年，1989-92年，1992-2012年和2012年至今。

第一階段是1978年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之下，環境保護很快就變成明確的政策問題，所以「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國策」在1983年被正式核准，至今一直是中國環境保護的關鍵政策之一。第二階段是在江澤民的領導下讓永續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生態與環境治理的主要戰略。而從2002年到2012年在胡錦濤的領導下，於2005年提出了「兩型社會建設」(節約能源，環境友善)概念，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當時核心概念。2007年「生態文明建設」一詞被列入中共十七大的工作報告之中。自2012年以來，變的不是「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中國共產黨政府政治生態與環境治理戰略的一環，而是環境保護與治理被看成是主要追求的目標，是「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象徵了新時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

CS：很長一段時間你的工作聚焦在生態社會主義的觀念上，你認為不但「綠化」資本主義不是當前生態危機的出路，「綠化」的傳統社會主義也不是答案。所你可否跟我們解釋一下生態社會主義？

郇：簡單來說，生態社會主義是一種綠色政治哲學，主要有兩個層面。第一，生態環境挑戰不僅是地方，國家，還是全球的，並且在當代資本主義霸權下凸顯其重要性，不是局部問題，而且與認識框架本身息息相關，也就是資本主義霸權的資本擴散和維護資本家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政府採取的各種的「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態資本主義」並不能根本地解決環境問題。不過如Ulrich Brand和Markus Wissen在他們的《The Limits to Capitalist Nature》一書中很清楚說了，這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綠色資本主義」完全沒有在現實世界中實現的可能(不過有的話也是選擇性實施)。

另外一個層面上，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是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或是說，是社會主義的進化版，有別於傳統社會主義的簡化或假的綠色主義。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世紀前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其實是一個理想，到今天無論是在前蘇聯還是在今天的中國都沒有被實現。可以肯定的是在可預見的將來此一理想也無法在世界任何國家被實踐。這就是說我們提出的是一種當代世界的生態社會主義，而不是替代性的社會主義。易言之，生態社會主義者今日的主要任務是搞清楚為什麼資本主義政府無法解決那些被宣稱可以解決的問題，以及為什麼各種生態社會主義，不論是真實的或激進的替代版本，都可以有辦法解決問題，讓「另一個世界成為可能。」

CS：在我看到許多論述中都認為生態社會主義是綠色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其不僅為生態危機提供了解決辦法，還解決社會不平等，目標是將環境正義與社會正義聯繫起來。但是你卻認為生態

社會主義目前沒什麼吸引力，為什麼會這樣呢？

郇：生態社會主義不僅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預期般的流行。我想有許多原因可以解釋這個不正常的現象。第一是生態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和公共政策仍受到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傳統社會主義名譽不佳的極大影響，像是 Saral Sarkar 在其書《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中說的，傳統設社會主義和價值觀在無法令人滿意地處理環境問題。第二，1990年代初期社會主義集團瓦解後，全球的新自由主義霸權在宣傳上相當成功，使大多數人相信歷史已經終結。有趣也遺憾的是2008年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也沒有帶給包括生態社會主義在內的激進或替代政治意識形態帶來比較好得的結構環境。近年來「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態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普及是證據。

還有，以中國為例，「生態文明建設」與「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可說明生態社會主義並不是傳統的政治思想或政治生態。一個歧異是在於社會主義是否是當今中國的環境保護和生態現代化的制度前提。若從生態馬克思主義來看，美國和歐盟角色的過度強調可能忽視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改造工程投下變數。

CS：生態社會主義作為未來社會的願景要如何增加吸引力？

郇：對生態社會主義者來說這毫無疑問是緊急又有挑戰性的工作。第一，社會主義或是綠色左派政黨是可以讓生態社會主義讓公眾更受歡迎和更有吸引力的主要力量，因為其可以發揮的地方很多，像是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可以看到選民，特別是年輕族群在相當支持候選變遷和全球環境問題，不過整體上的左派並沒有拿到比較多票。第二，我們應該進一步加展開學術界中生態社會主義問題上的全球對話與合作。這當然是說西方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要平起平坐，攜手合作。平心而論，過去的幾十年中國一

直在努力模仿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路徑，一直是學習西方的「模範生」。但現在開始中國要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獨立和反思的角色，真正幫助讓中國變得更好。第三，若生態社會主義要在中國更具吸引力，那關鍵之一就是使「新時代具有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有吸引力。我想關鍵還是有意識地宣傳

CS：您可以區分「壯大經濟」和「追求成長的經濟」，後者取決於持續的經濟成長而無法解決生態危機。這種區別對中國來說意義為何呢？

郇：我2008年使用「追求成長的經濟」理論化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彰顯我和希臘思想家 Takis Fotopoulos 的不同，後者說的是看持續發展是否與全球化並存去解決問題。我們看看中國的發展就知道，就合法性來說，資源可取得性和環境的永續性而言，中國在21世紀初的經濟成長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必需的和可辯護的。不過過去的十年中，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狀況改變很大，與美國的貿易戰也讓當前中國面臨更大挑戰。

相關問題真正的挑戰是中國經濟是否是 Takis Fotopoulos 定義的追求成長型的經濟體。我認為個問題仍然沒有簡單的答案。一來自2015年以來中國年經濟增長率為6-7%，是十年前(2005年為11.4%)將近一半，顯示中國根據發展的不同階段經濟進行改善，至少對於中國中西部保持適當的經濟成長率是必要的工作。再來若考慮到中國的現在經濟，跟據世界銀行統計2018年中國的經濟總體為13.608萬億美元，是全球的15.86%，若年成長率只有5%也是很可觀，並對生態環有巨大影響，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認為生態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是貢獻世界的潛力的，因為其以同時滿足人民基本需求和也保護生態環境的，我們需要更多生態主義和更多的社會主義。

CS：在歐洲和北美，綠色資本主義是對生態挑戰的主流回應。我們從你提勾勒的願景中可以獲得什麼？

>>

郇：「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態資本主義」可說是歐洲和北美面對生態挑戰的「理性」的務實取徑，這是由於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的階層化以及在發展中國家廣為接受「帝國主義的生活方式」的結果，而「已開發」國家設法利用全球資源去保持自己優勢。此一結構若持續下去，那麼生態社會主義的未來世界不太可能實現。

然而，這樣的界構持續在社會和生態製造麻煩與問題。一方面我們看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個主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崛起，美國和歐洲國家想要維持國際秩序的現狀變得比較困難了，因為威脅到西方國家的霸權宰制。易言之，是越來越不可能讓這些「先進」國家同時維持在地良好環境的同時繼續享有「生態資本主義」的綠色模式。某種程度上，以美國帶領的西方世界和中國之間摩擦可以從這個觀點來理解。另一方面，包括中國在內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以不同的角度相當認真看待生態問題，這代

表了發展中國家對於「骯髒」資本和技術有越來越嚴格的標準，遑論對於廢物和垃圾的清理，這點從菲律賓和加拿大之間關於廢物進口的爭議可以清楚看到。

總結以上兩點，我想生態社會主義可讓歐洲和北美國家認清「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態資本主義」的局限和不足的事實，讓其他人付出代價去解決西方世界的問題這樣的行為必須停止，我們也必須盡快開啟社會生態轉型，畢竟，乾淨的環境是平等社會的前提。■

來信寄給郇庆治 <qzhuang@sdu.edu.cn>

# > 巨變75年

Brigitte Aulenbach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奧地利, ISA經濟與社會(RC02), 貧窮、社會福利、社會政策(RC19), 工作社會學(RC30), 女性、性別、社會(RC32)研究委員會委員, Andreas Novy,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WU), 奧地利



波蘭尼的《巨變》一書重要性可以在其已經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被印證。來源：Ana Gomez。

**巨**變是波蘭尼的巨著，其於1944年出版，他看到了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世界變遷與發展，重寫了二次戰後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文化史，重要事件包括了1929年的大蕭條，法西斯主義抬頭，社會主義對經濟和社會秩序的重組，以及新政的影響。

《巨變》研究的資本主義歷史上的事件如何在這樣的脈絡中展開，此脈絡事由「自我調節市場」(《巨變》)的「自由信條」所組織起來的。「市場社會」是由需求，供給，價格和，利潤所構成的系統，而這樣的系統中，「人類社會是經濟系統的子集合」(《巨變》)，其他部份集合包括了生產過的要素，土地(自然)，勞動力，貨幣，包括「虛擬貨幣」在內，後來變成了「商品：」「勞動和土地只不過是每個社會中人類本面對自然環境，若將市場機制導入意味著將社會的本質等同於市場的本質」(《巨變》)，於是最終會「毀滅」(《巨變》)。波蘭尼分析的「雙重運動」包括「市場運動」和「社會運動」(勞工運動，政治立法，社會保護)，其結構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人類社會因此獲得安全與保障。

Michael Burawoy 在2014年於橫濱舉行的ISA世界大會的演講中強調了《巨變》的重要性，論及了1970年代(1989年後共產主義崩潰後全球劃時代)所掀起的新的「市場化浪潮」、2007-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雨後春筍的抗議活動，這總結起來可以被概括描述為波蘭尼筆下的雙重運動。的確如此，特別是我們看到1990年以來人們對波蘭尼的作品可說相當感興趣，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都爭相引用參考其「雙重運動」的研究，挪用他的「虛擬商品」的概念。他們另外還重新發現了「複雜社會中的自由」的精闢見解，和「自由主義」的獨門看法。工業文明史上「當自我調節市場的烏托邦成為

過往雲煙的時候」，公平與正義自然就會降臨人間(《巨變》慶賀《巨變》出版75週年，收錄文章談到了波蘭尼個人的歷史，學術，和方法論。Fred Block 和 Margaret R. Somers 分析波蘭尼的著作時，特別從新自由主義者海耶克和西斯主義的角度去詮釋，聚焦對理解當今威權主義的當代意義。Antonino Palumbo 和 Alan Scott 超克國家與市場二分化約，解釋國家和市場的牽手合作。Gareth Dale 對國民所得會計的歷史進行了批判性的回顧，考察利潤為基礎的經濟秩序，然後以此為基礎去對波蘭尼的「超越GDP」辯論進行頗吸，而Jonathan D. London 研究東亞的巨變，歸因到市場化和福利政策一起出現的吊詭。Attila Melegh 和 Chris Hann 結合了對波蘭尼當時的研究和右翼民粹主義去思索歐洲移民的當代議題。最後，Andreas Novy 強調波蘭尼的知識遺，對社會運動研究的啟發，對當代「全球」資本主義的批評，以及對另類烏托邦的追尋。■

來信寄給 Brigitte Aulenbacher <[brigitte.aulenbacher@jku.at](mailto:brigitte.aulenbacher@jku.at)>  
Andreas Novy <[andreas.novy@wu.ac.at](mailto:andreas.novy@wu.ac.at)>

# > 波蘭尼巨變75年

Fred Bloc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美國, Margaret R. Some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美國



波蘭尼在一次大戰。來源：Kari Polanyi Levitt

1964年波蘭尼過世的時候其貢獻顯為人知，只有經濟人類學家和希臘和羅馬古代的學者們才知道這個人。他是難民知識分子，曾旅居奧地利，英國，美國，加拿大，不屬於任何一個學科，研究包括歷史，地理，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古典研究，所以其追隨者和粉絲太過於分散，無法成為享譽聲望的難民知識分子。

此外，波蘭尼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巨變》被用來證明是不可靠的先知。最後幾章中他說到世界已經知道建立全球市

場的想法是錯的，但是，二戰後經濟的「鑲嵌自由主義」沒有像戰前金本位那樣具有破壞性。凱因斯主義的福利國家在是1940年代，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主流，但離波蘭尼所設想的社會主義烏托邦還差得很遠。況且波蘭尼沒有看到到冷戰，也沒有預測到華盛頓要重建世界經濟秩序的野望，好讓商品和資本可以自由流通全世界。

諷刺的是，其去世後發生的事件反而鞏固了波蘭尼的名聲。波蘭尼於1920年代的維也納開始形塑自己的思考，反對Ludwig von Mises和學生海耶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波蘭尼去世十年後，海耶克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其是英國首相柴契爾和美國總統雷根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理論導師。但是過去四十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政策讓波蘭尼從沒人知道到變成最有名的思想家。

## > 金本位和法西斯主義

波蘭尼在《巨變》一書明確地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歸咎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恢復國際金本位體制，這裡指涉了布爾什維克在內的各種光譜的政治人物。可是一旦對經濟弱勢的人執行金本位緊縮政策，社會主義者和政治自由主義者都會起身反對，因為其對工資和公共支出的壓縮，還有對民主的危害，這讓反對得以可能。

銀行家和大多數雇主認為金本位是自然經濟規則的體現，擅自更改這個規則會導致經濟的災難。他們論點很大的機會會被看成自私自利，且von Mises和海耶克的論正式一種對日益增長的經

>>

濟不平等和失業的辯護，要求政府不要介入。對於波蘭尼來說，他們的說發既殘酷且不道德，政策害人害己。你可以想像有成千上萬的家庭可以接受經濟痛苦，這不可能，況且其中大多數家庭沒有任何經濟上的原著。波蘭尼也支持工人投票，夠用的工資，失業救濟金，這些都被擰節受阻，結果就是民主制度的幻滅，這是因為金本位限縮了人民權利。

法西斯主義政黨充分利用這種虛幻承諾去拒絕提供適度的安全舉措，所以波蘭尼認為「(經濟)自由主義者不讓任何進步計劃實施，管理，或是控制，這讓法西斯主義不可避免的會贏得升力。」不過掌權之後的希特勒便無視金本位的限制，馬上刺激就業，所以最後納粹贏得民眾的支持，並鞏固其獨裁統治。

### > 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威權主義

現在的情況至觀重大，40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就發明了一種永久擰節的政策去阻止政府介入提昇就業率或保護家庭免於受到市場波動的危害，若政府考慮要去挑戰就會讓主權債務的市場拋售持有債務和外部資本報復，所以希臘激進左派政府當初是靠反對擰節勝選的如今也被歐盟強迫實行嚴格的擰節政策。

民主制度已經幻滅了，永久擰解桎梏了民主。右派政黨利用民主制度去的蔑視之然後壯大之。最後新生代的領導人使用「自由民主」模式，講白了就是選舉操縱，司法禁燬，壓制自由媒體，

政治仇恨將「人民」與「他者」切開。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威權主義的當態樣貌與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不同。可是若是因為現在威權主義沒有穿軍服和製服而就安心了的話，這很愚蠢。歷史相次不是比較的基準。波蘭尼認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西斯主義威脅是對金本位的霸權所造成的民主危機的結果。如今我們再次面全球經濟引發的危機。現代威權主義者就像其先行者一樣陷入了危機造成的真空之中，並且保護「被遺忘的人」的名義進而去迫害他們的「敵人」。

我們從中該學到的是說，全球經濟改革的緊迫性可能會破壞掉永久擰節，並化解無能民主的危機。可以確定的是我們要去建立強大的全球改革運動。氣候變化讓全球難民人數急劇增加，所以全球經濟陷入無秩序的危機，要談全球合作簡直如愚公移山。不過現在全球綠色新政可能可以凝聚全球大多數人，因為其把資源從全球北方重新分配到全球南方，所以要解決氣候問題，改變全球經濟的制度和遊戲規則。這個全球倡議將在國家和超國家內展開，更新民主政治，進行改革，創造以人為本的經濟。

來信寄給 Fred Block <[flblock@ucdavis.edu](mailto:flblock@ucdavis.edu)>

Margaret R. Somers <[peggs@umich.edu](mailto:peggs@umich.edu)>

# > 市場作為國家統治技藝

## 波蘭尼的觀點

Antonino Palumbo, Palermo University, 義大利, Alan Scott,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澳洲, ISA都市與區域發展委員會委員(RC21)



波蘭尼在Pickering, Ontario, 1950年代。  
來源: Kari Polanyi Levitt.

**把**經濟學家(正統)排除在外，我們會看到包括社會學和人類學在內的社會科學家長期以來就說完美市場競爭是不自然的人類行為。由此出發，這些學者奮力為主權國家辯護，為的是去證明國家干預市場是合理的。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這樣的努力更為用力。主權國家的債務危機的基礎前提上去採取擰節政策為的是去解決金融危機，國家行動主要包括兩種：(i) 凱因斯主義的介入是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所作的政策干預；(ii) 以戰後福利國家的鄉愁為基礎，採取旨在減少社會不平等的重分配政策。雖然這些普遍存在進步陣營內，可是不論概念或是執行上都不成功，因為其無法反駁被廣為接受但是沒什麼正當性新自由主義主義，也就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相互妥協。

### > 國家作為市場的擁護者

兩個世紀以來的社會史和政治史並不支持這種關於國家與市場之間關係的零和遊戲。波蘭尼的《巨變》(1944年首版)就是最好的論證。若我們總結波蘭尼對自由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批評，那就是為了實現市場社會，自由放任政策是一種政治，支持保護監管的社會意見是是對自然保護主義的自然結果。波蘭尼認為使市場成為政治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徹底揚棄政治經濟學的二分。他認為國家既是建立市場經濟的行動者，也是擁抱市場預防發生危險的行動者。國家不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而是的的確確的政治原因去增強國家權力，不是因為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思想在政治和技術精英的霸權導致。

市場可以怎麼樣幫助國家增加主權？從波蘭尼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得到靈感，就是市場能夠通過使各個群體相互競爭來破壞個群體的關係。所以市場具有軍事硬力量和軟實力，靠的是破壞了社群的合作和自治，使國家可以有能

>>

力集權，不怕官僚主義的反亢。專制國家會對社會進行鬥爭，自由主義國家的與封建權威，中介，專業等鬥爭是目的。蘇聯軍隊對市場社會主義表現出的興趣和以及中國共產黨對新自由主義市場的擁護就是體現了這種邏輯。所以我們不該忽視各種市場模式去破壞那些積極抵制國家介入的那些公民團體的工具。與馬克思（及其追隨者）不同的是，波蘭尼對市場的批評不是只看工人的剝削和（或）異化，而是關注理論上的必然結果：社會組織的凝聚力降低，關係變得脆弱。

### > 殖民的邏輯

追求這種集中化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國家在國內（殖民原住民和內部敵人）和國際上（國家的統治權強擴張到外國領土和人口）都是一種殖民。歷史上來說這兩者緊密扣連。外部擴張是國家減少市場改革產生的之內部社會衝突（亦即「社會問題」）的必備方式，這點可以從內部和外部殖民形式之間的相似觸看出箇中原因。國內層次上的國家是去鞏固進程，要求經濟精英分擔利益與成本然後共謀。在國際層次，殖民國家靠的是殖民者去在地族群或社會精英的合作。兩者都是用來建立的聯盟，競爭，迫使其成員以自利的方式定期重新協商。因此經濟和政治危機意味著責任轉嫁給其他盟友，然後重塑市場機會，於是有了波蘭尼所描述的監督和放鬆管制的景氣循環。

### > 重新連結社會與政治

國家與市場的相互依存關係以及策略脈絡讓這種以國家主要求國家介入且減少市場的論政治不僅膚淺且大錯特錯。事實上市社會對於國家的支持去採取緊急措施好讓國家行重新協商過程中的有較多的議價能力。同樣地，人們對主權貨幣的違約，加稅，資本外逃的恐懼心裡也被拿來消費加以利用，好增加談判桌上那些的壟斷經濟和社會精英的權力。過去十年我們會看到新自由主義共識的聯盟成員所採取的行動是讓新自由主義共識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破壞。我們若要避免再度發生類似歷史事件，需要的不是只有倡議窮人的福利政策，重要的是社會問題必須與政治問題重新跨勾，也就是市場和政府的雙重民主化。波蘭尼對社會權利和工業民主的強調無非就是這點，公民權力若要擴大民主範圍就必須超出市場範圍，包括擴大消費

者權益，法律監督機制，房地產的限制政策，而金融，環境，自然問題的會因為眼前經濟利益被轉嫁給後代，得承受新自由主義失敗的去烏托邦，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惡果。■

來信寄給 Antonino Palumbo <[antonino.palumbo@unipa.it](mailto:antonino.palumbo@unipa.it)>

Alan Scott <[ascott39@une.edu.au](mailto:ascott39@une.edu.au)>

# > 波蘭尼，會計，超越 GDP

Gareth Dale, Brunel University London, 英國



波蘭尼在維也納，1923年。  
來源：Kari Polanyi Levitt.

**波**蘭尼在辯論關於 Ludwig von Mises 對於社會主義會計的問題的時候這麼說：「會計是對經濟活動的量化描述。例如資本主義圍繞著利益而打造，所以會計提供了資本主義各個組成部分和利潤之間關係的總體描述。一支軍隊的活動限於利用金錢和資源去達成軍事目的，所以某種意義上其量化描述本身就是目的，是一種控制的手段……」波蘭尼也說道，就是會計的主要目的「簡單來說就是會計必須提供量化的數據去解答我們所有關於經濟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本質也決定會計的本質。例如，資本主義將利潤最大化作為目標，

因此會計就是要以量的方式去分析其每個資本的不同組成與獲利的關係。」

波蘭尼在這篇文章中定義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會計原則：利潤。他並且用了軍隊的會計（「可以控制」）來說明。我們要簡單講一下，也就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會計辯論和轉變開始講起。其中一個是波蘭尼加入的社會主義會計辯論。另外就是國民所得估計的革命。而美國制度論經濟學家 Wesley Mitchel 是開山祖師，其批評新古典理論是「質化的」，從而推動量化經濟學，讓經濟學可以測量一切經濟活動。

## > 國民所得會計系統的誕生

波蘭尼在 1920 年辯論社會主義會計前，Mitchell 成立了國家經濟研究所，其旨在系統化地收集資料，然後進行嚴謹的統計描述。Mitchell 是現代國民所得會計的概念發明者之一，他用實際數字最為基礎，並影響了 Philip Mirowski 在其著作《The Birth of the Business Cycle》中所謂的「新的理論單位」的概念。這著作為經濟學的總體經濟革命（凱因斯理論）以及國民生產毛額（GDP）鋪路。1932 年，美國國會委託 Simon Kuznets 給出了測量國家生產總額的公式，也因此帶出了國民生產總值（GNP）和 GDP 的概念。1930 年代的 Colin Clark 試著用統計方法估算年度「人均實際收入增長率」，以及 1936 年 1 月的 Jan Tinbergen 發表的「號稱第一個代表整體經濟的動態模型」。

國民所得會計一開始是由改革派的想法，若政府要有效干預好解決大蕭條問題，所需要的是統計。Kuznets 的初衷是配合社會福利的所得會計，包括用「可以賺錢」去扣掉「不能賺錢」的像是軍備。如 Marion Fourcade 在《Economists and Societies》中所說的，Kuznets 和 Mitchell 的社會福利關懷被戰爭計劃的緊迫性和凱恩斯總體經濟學和需求管理理論的優先性所忽略了。Kuznets 使用其在商務部所開發出來的國民所得會計系統去幫戰爭規劃部規劃軍事管理適宜。軍事支出，薪餉，軍備費用被包括在 GDP 中，但是社會福利支出（社會保障和失業救濟金）被排除在外，

## > GDP 的問題

GDP 本質上來說是從合法交易的交換價值的觀點去測量經濟活動。其「獎勵」商品化：你唱一首歌無助於 GDP 提昇，但是若要買票才可以聽你唱歌就可以。GDP 排除任何了沒有金錢價值的勞動，像是家務，DIY，自願性工作。這是對性別和階級的歧視，忽略了收入分配。它也歧視自然，把自然資源當作商品，無視大自然破壞。

GDP 因此是一種服膺交換價值的經濟指標，是資本主義的工具。不過，各個國家有自己的標準，用來描述「國民經濟所得」的狀況。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工具，不是對利潤直接感興趣，而是以資本利益的角度去管理社會。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軍隊的統計與計畫不會與資本主義精神違背。

我們今天對於 GDP 的辯論可謂古今以來前

所未見，「超越 GDP」的呼聲越來約多，包括了無論是出於對增長的懷疑，出於對 GDP 增長緩慢的憂心，對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損害，所以政治人物和學者，像是 Nicolas Sarkozy, Jacinda Ardern, Gus O' Donnell, Joseph Stiglitz, Amartya Sen 都在呼籲要找出替代 GDP 的方案。

對於波蘭尼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David Yarrow 而言，超越 GDP 的政治議程將是一個可以挑戰市場中心的「經濟」替代方案。如果真的可行，那是再好不過了。因為 GDP 沒有定義核心的經濟目標，其目標只是競爭性積累資本，會計原則是公司管理原則，不是國治理的原則。如果是這樣，那麼當對只在乎成長的批評只針對 GDP 而又擁抱資本主義，那真正的原因將永遠被掩蓋掉。■

來信寄給 Gareth Dale  
<[Gareth.Dale@brunel.ac.uk](mailto:Gareth.Dale@brunel.ac.uk)>

# > 巨變：市場化東亞

Jonathan D. London, Leiden University, 荷蘭



波蘭尼。來源: Kari Polanyi Levitt.

**全**球市場的擴展和深化可說是種巨變。「市場化」就是意謂了這樣的過程。幾十年來全球市場透過「波蘭尼」式的深化而蔓延開來，反映了市場化和的程度，也說明了了精英政治目的是使社會生活服務於特定利益，成為工具。易言之，市場化大大造成了在地的後果，福利和不平等惡化可說是全球也是在地的現在進行式。

全球市場化伴隨著貿易和投資的增加，另外還有工業化，金融化，資本積累，不平等惡化等相關；像是不平等日益加劇，氣候變遷造成的生態災難等，資本主義的括成讓這些國成相對容易，利益就是全球資本不斷累積的動力。在世界上的市場化和「親市場」原則掩飾了事實上是腐敗的系統。這導致了全球化和政治腐敗，造成社會不安全。此外，雖然平均收入增加和消費增加帶來了財富，但不平等惡化了。真的有這麼嚴重嗎？市場化其實是讓世界變得更加富裕，特別是在東亞。所謂東亞是日本和印尼之間的20多個國家。東亞市場化可以作為經驗個案讓我們去從事波蘭尼式的巨變分析。

## > 東亞的「雙重運動」

市場化的倒數三十年來可說是涵蓋了全球的多數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東亞的經濟發展最為顯著。根據世界銀行調查，1990年至2016年間，生活在「極度貧窮」的東亞人口比例從60%以上降至3%不到。然而這裡的統計不包括東南亞相對較貧窮的市場社會。雖然有人會說貧窮線的標準人言人殊，但是區域這種日益不平等的現象還是明顯的。東亞的高，中，低收入國家的市場化改善了人民生活水準，但也讓平等惡化，剝削的程度也相當嚴重。此外，東亞市場化也是「雙重運動」的例證。

全球市場的特別有趣的一點是雖然新自由主義霸權不斷擴張 (Dale, 2012)，不過一直這樣下去，世界上的所有國家的社會政策會越來越大。中低收入國加和市場化的國家社會政策的擴展反映了全球化的市場社會或社會秩序的制度化的進程，也就是社

>>

會關係和制度形塑了兩者。

東亞的這種雙重運動之規模，範圍，速度和複雜性讓人吃驚，特別是考量了不平衡的發展背景下的雙重運動。放眼整個東亞會看到教育，衛生，社會保護的規模和範圍大肆成長，包括公私領域都是。在韓國和台灣，甚至在泰國，印度尼和菲律賓，社會政策的擴張已因為選舉進程很快，得利的是政治精英。相對較富裕的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其他不民主的國家很快就有教育，公衛和社會保護，但是貧窮也因此被鞏固。在中國和越南等名義上的反資本主義的共產黨擁抱市場社會，行使威權主義政治，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並為人口提供了基礎福利，這是超出政治和經濟資本。柬埔寨，寮國，緬甸也是亦步亦趨。

### > 雙重運動的本質

放眼全世界來說，東亞發展作是波蘭尼雙重運動最好的鐵證，也就是說，工業化比較慢開始的的東亞被逐漸融入了全球市場，然後有相對應的社會政策。所以使得內部市場所需要的社會流動之所以可能產生。至於社會政策的全球進程上，Harris 和 Scully 指出事實上全球南方的商品化先發生於新自由主義之前，雖說新自由主義有很大的動力，但是掩蓋了「商品化」的真實過程。的確如此，國際勞工黨報告指出2019年全世界會有一半的人口將受會於社會政策。

東亞社會政策擴張的懷疑論者認為的波蘭尼雙重運動的新自由主義者假扮的，這樣的運動使東亞地區的人民揚棄普遍主義和反商品化原則，擁抱市場與新自由主義民主的公民身份。這種新自由主義的雙重運動其實是預設了透過市場機制可以促進社會福利，以及社會政策反過來也能夠改善市場機制。結果就是不平等的惡化，商品化導致社會階層化。事實上東亞地區的國家機器是資本積累的機器。

那麼我們要如何進行東亞巨變呢？要怎麼改善不平等（如果生活領域的不平等），要怎麼增加收入，要怎麼擴大社會政策的影響範圍呢？

### > 社會秩序的建立

東亞若要巨變，那我們就要對東亞國家的社會秩序進行分析，掌握其轉型動態，討論社會關係與制度。在韓國和台灣甚至可

以看到波蘭尼所說的市場重新鑲嵌。在中國和越南則是列寧主義的市場秩序的鞏固帶來了雙重運動。放眼東亞的社會政策，市場已經透過社會分層而成為霸權。若更大一點來說，就是東亞精英建立了社會秩序和市場公民身份，普市主義社會政策的不足，雖然是有提供基本的服務，然而服務卻和工資綁在一起，導致東亞不平等惡化，持續的經濟不安全狀況和生態災難降低了生活品質，增加消費主義的瀰漫，社會政策的普及，這些都是巨變的徵兆，波蘭尼可能不是這麼希望，但是我們還是要樂觀，不到最後關頭不要放棄希望。■

來信寄給 Jonathan London

<[j.d.london@hum.leidenuniv.nl](mailto:j.d.london@hum.leidenuniv.nl)>

# > 人口置換的恐懼

Attila Meleg,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波蘭尼中心創辦人, 匈牙利

**東**歐之子波蘭尼的理論驗證了東歐人口現象。《巨變》解釋為什麼市場烏托邦許要「保護封套」去避免「虛構小說」，波蘭尼另外也在1945年還論證自由市場會在東歐激起民族主義的危險，他說：

「如果《大西洋憲章》要做的是去讓自由市場起死回生，那這樣一來民族主義將重返讓世界陷入瘋狂。」(波蘭尼，「普世資本主義或區域規劃」)

Chris Hann 在其新書《遣返波蘭尼》中指出「全球新自由主義秩序」便是歐洲民族主義的誕生原因。在這文中我想說的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包括歐洲，東歐(特別是匈牙利)就是要去建立全球市場烏托邦。但是這些地區的國家跟外國資本說不，反而用移民或是逃離的難民去取代國內的勞動力人口。1980年代後期開始，新自由主義見證全球人口急劇變化的社會過程，於是讓移民成為一種所謂的社會議題。

- 遷徙的速度在全球化時代超過人口增加的速度，但是生育率卻持續下降，少子化加上人口嚴重老化。然後死亡率卻是呈現放緩成長的趨勢。

- 資本流動增加造成了移民人口流動增加，資本流動性也讓公民社會失去根基。經濟結構因此失調，不確定性增加，工作和家庭生活變得穩定，導致安全感

的低落。

- 福利國家興起和勞動競爭的關係，移民的爭論是相當機動的(特別是移民控制和歷史)。要怎麼說明這種現象？如上所言，生育力降低，人口老化，年輕勞動力參與率下滑，低薪，跨國精英也沒有賺比以前多，所以 Böröcz 在2016年關於「全球再分配中的不平等」一文中說道，1990年代中期開始重分配的功能已經不再有效。

## > 歐洲因素

與全球平均比較起來，歐洲生育率是低的，老化速度也塊，失去了大陸地區的一些原本該有的優點，這代表了人口是在歐洲的移民議題上面越來越顯著，與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移民與福利競爭論述高度關聯，資本的流動性很高(外國直接投資的金額是超過全球平均的)。為了要讓流動性增加，社會主義經濟體被改變，導致了失業，人口出走，社會不穩定等問題。還有全球平均幸福水準來說，歐洲是很好得，其全球重要性因此下降，遷徙率也一直提高，甚至比全球平均高。

如果我們比較長期就業，可以看到東歐國家從1980年代的歷史最高點是遠遠超出全球標準的，勞動力參與率卻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遠遠落後。2010年代起死回生。所謂兩個失落的十年是影響深遠的。

>>

## > 區域地方因素

這個歷史告訴了我們當時社會基礎的去鑲嵌化。如Hann說得，巨觀上來說，「市場社會」的方向被打破，這違反了日常生活習慣。匈牙利則出現了大宗移民流入的現象，但政府只接收來自鄰近地區的移民；根據聯合國數據我們知道2015年有超過2500萬的嬰兒出生在東歐地方縣市，但是不在當地居住。同時，另外一方面，移民總數超過1000萬，這說明了什麼呢？這說明人口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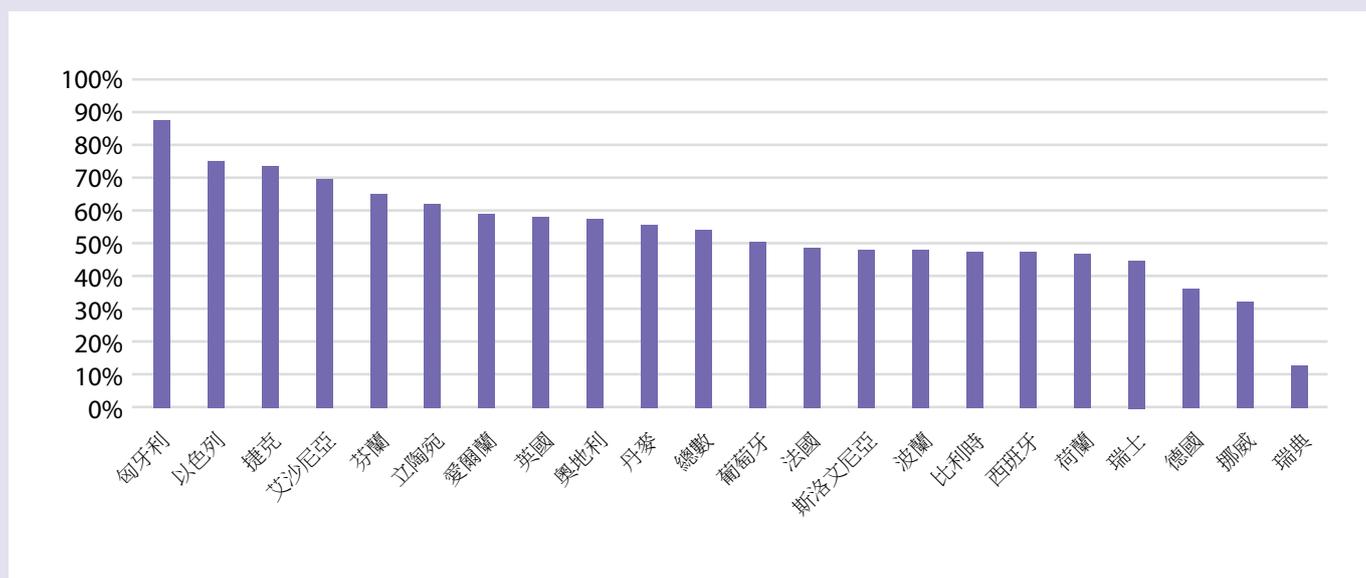
西方國家因為資本流入和勞動力流出的不平等後果包括了：勞動力與技術的消失，勞動力需求與勞動力供應的不搭嘎，若我們從國家及社會福利而言，稅收會損失，特別是在整個人口老化的脈絡中更加如此。我們可以這麼說，全球人口增長是事實，可是歐洲人口增長趨於穩定與此相反，人口統計學的角度而言，東歐國家若沒有社會福利的緊張，那也沒辦法運作。這也是為什麼東歐人開始非常擔心人口置換的問題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商業和資本是一種「移民勞動的虛假交易」。新自由主

義中的勞動力人口是被送出母國去用來「進口」的。若是人口結構不穩定，此一議題很容易成為民族主義滋生的溫床。然而也很矛盾和可悲的就是說，當新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歷經戰爭或是為難的時候，這樣所代來的恐慌很有用。只是民族主義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只有全球雙重運動也是靈藥仙丹，並且拯救世界緊張的局面，所以機械式調整人口結構是萬萬行不通的。揚棄新自由主義是唯一的出路了，如此一來，全世界的移民和人類才有光明的未來。■

來信寄給 Attila Melegh <[melegh@demografia.hu](mailto:melegh@demografia.hu)>

允許比較窮的國家的移民的排序  
歐洲社會調查(在難民危機之前)



來源：歐洲社會調查(ESS)，[https://www.europeansocialsurvey.org/download.html?file=ESS7e02\\_2&y=2014](https://www.europeansocialsurvey.org/download.html?file=ESS7e02_2&y=2014)，2014/15，2019年10月15日使用。

# > 邁向民粹之路

Chris Han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德國



Keleti火車站移民，位於匈牙利 Budapest, 2015年。來源: Chris Hann.

**波**蘭尼 1944 年 3 月出版的《巨變》是海耶克《邁向奴隸之路》的早一個月。這兩者都不算是專業社會學或社會科學著作，而是為了吸引更廣大讀者群而撰寫的書。不過海耶克的書很快就達成銷售目標（部分原因是美國雜誌《讀者文摘》出版了精簡版本，可是波蘭尼的書那麼厚，卻也銷售得不錯。儘管波蘭尼和海耶克都受奧地利經濟學影響剖深，可是風格和內容大相逕庭。波蘭尼深入探討了英國經濟史和殖民地，提出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哈耶克則是艱澀難懂，認為自由主義的經濟核心是個人自由和經濟效率，波蘭尼認這導致法西斯主義。哈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計劃導致極權主義，國家不能干預自由市場。本文不探討 1944 年的複雜知識史，反而比較這兩者

>>

經濟哲學與 75 年後的當今世界的相關性。

### > 鑲嵌自由主義的起落

戰後最初的幾十年通常被認為是經濟「重鑲嵌」的時代(即是「巨變」的理論)。凱因斯主義的經濟管理緩解了波蘭人「雙重運動」(一方面是市場原理,另一方面是社會「自我保護」)帶來的緊張,維持高就業率和福利國家。作為社會主義者的波蘭尼並不太管這方面,對北歐福利國家的想法也不怎麼喜歡。然而,這的混合經濟和 Bretton-Woods 體系所形成金融體系使自由民主國家得以繁榮發展。

1970 年代 Bretton-Woods 體系的崩潰瓦解,1980 年代雷根總統和柴契爾總理(尊海耶克為導師)批評相鑲嵌經濟,宣揚自由市場。隨著蘇聯碎裂,新自由主義席捲全球。中央計劃經濟不再,私有化和市場化導致了極度混亂。多數後社會主義東歐國家最終加入歐盟,東方的新貴精英與西方的舊精英聯手放棄 Treaty of Maastricht。歐元創立了,市場主義抬頭,資本和勞動力流竄,「社會的歐洲」已經被拋珠腦後。2007 年開始的擰節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反應突顯資本主義的不合理。

### > 制度化市場和民粹政治

經濟鑲嵌在社會文化和製度中,這不論是你蓄、消費,或為了更好的工作遷徙等,還是為了接受 Heimat 都是如此。去鑲嵌化的比喻很難片面用文字說明:我們要用波蘭尼所說的「制度化」才可以理解。自由市場制度其實很依賴國家去捍衛財產權,維護自己的利益。若波蘭尼今天提出箴言,他可能會知道跨過大企業可以輕易避稅,只對自己的股東負責。並且對世襲政治,像是現任匈牙利的政治操弄(歐盟)就是拋棄了人福祉,發展成一種恩庇侍從主義。

經濟新的制度化與「民粹主義」一起影響了全球政治。匈牙利的歐班或美國的川普都懷疑資本主義與民主是否相容。波蘭尼的理論對雙重運動的分析在此顯現出了一種預言的魔力。匈牙利從 1960 年代中期開始有「嵌入式社會主義」,如今卻擁抱全球自由市場經濟,並防衛自己,價值保守。然而這說明了透過民族主義去掩蓋社會的階級分裂。儘管羅馬和猶太人是代罪羔羊,布魯塞爾(新自由主義歐盟的所在地)已取代了莫斯科(舊的中央計劃經濟)成為主要的敵人。具體不太一樣,但是若看看歷史,民粹主義時來自這樣的脈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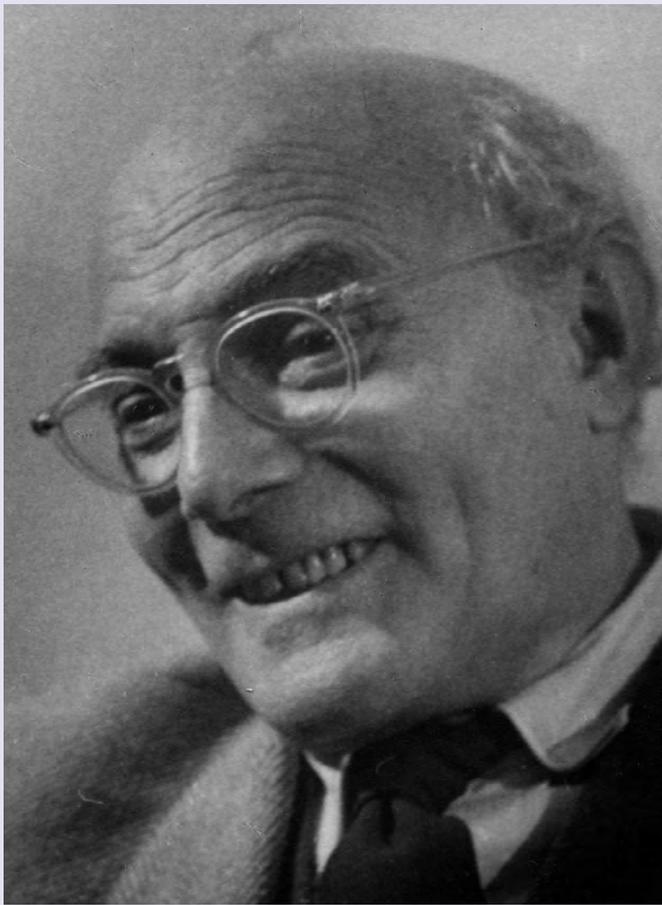
《巨變》是對反社會主義、支持市場基本教義的《邁向奴役之路》一書的很好的分析,兩本

書都已被重印多次並被廣泛翻譯,但是波蘭尼沒有被收錄到《讀者文摘》。海耶克的書總是賣得比較好。最重要的是,在冷戰結束 30 年後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社會主義一直被醜化,我們要揚棄這樣的傾向。波蘭尼為的最簡單觀念:自由市場的自發性是個人自由的最佳保障,提供了替代道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可不可以用凱因斯自由主義來解決海耶克意識形態危機的問題,而我們是否真的邁入資本主義「終結」呢?樂觀主義者如波蘭尼是肯定的。■

來信寄給 Chris Hann <[hann@eth.mpg.de](mailto:hann@eth.mpg.de)>

# > 波蘭尼的深遠影響

Andreas Novy,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WU), 奧地利



波蘭尼於 1964。  
來源: Kari Polanyi Levitt.

尼則懷疑市場社會的存在價值。波蘭尼認為市場社會缺乏社會凝聚力，因為獨立的分工和利益凌駕於社會和政治價值。

波蘭尼也是合作社運動的支持者，其景仰 Robert Owen 的行動，反全球化，倡導社會經濟和團結經濟，因為這是一種賦權，不論是對於農民，工人，或是個人，乃自社會。這種自我管理和參與民主是很好的，行動者具有自主性，以合作取代競爭，「重新融入社會經濟之中」，不會有過多對於物質的貪念和欲望，透過這樣達到社會經濟領域的民主化，經濟有自主性，民主理念也不侷限於政治。集體決策和課責制並須落實到經濟和生產領域。這體現在許多的社會運動之中，從下至上達到社會創新。但是這些人卻也常常是受害者，其無法真正超越在地的結構性限制。

**知** 名人類學家卡爾波蘭尼於 1964 年去世，其把經濟學看成「必要的生計組成」，並篤信此一看法。在經濟學裡，Douglas North 強調制度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榮獲諾貝爾獎。波蘭尼則是從 1970 年代開始就是跨學科的社會學家。North 與波蘭尼不同，因為其橋調市場，房地產，契約。社會學家 Mark Granovetter 把波蘭尼的鑲嵌概念推廣，研究市場社會中的市場功能，但是波蘭

## > 波蘭尼隱性的空間分析

波蘭尼著作中一個面向常常被人們所忽略：隱性的空間分析。波蘭尼認為對市場的批判不等於拒絕所有類型的市場。這就是一種對「無所不包的大市場」的批判，「無所不包的大市場」是商品交易的市場，包括未出售的物品。1930 年代「無所不包的大市場」之基礎是黃金，黃金讓所有社會經濟活動可以

>>

相互比價，交易。波蘭尼認為這種經濟自由主義的烏托邦是反烏托邦的。他早在二十世紀末發明「全球化」的概年以前就批評「全球資本主義」以及「機器革命」了。

不過這一切要到 2000 年網路泡沫化和 2008-9 年金融危機之後，其所批判的「自由市場經濟」才因為所災難性社會和生態後果讓人們同意其說法，也影響了許多人的看法。新自由主義的四十年和生活各個方面的節約導致跨學科研究和跨學科研究的增加。社會學者 Michael Burawoy 應用波蘭尼的概念和方法研究自然，知識，資料的商品化。新自由主義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相當廣泛，從性別分工到教育和健康都是，隨著金融市場的興起也日益深化了這個意識形態。

### > 新自由主義和對於多元替代世界的需求

全世界對新自由主義化的學術和政治的抵抗讓波蘭尼成為那些對改變以市場邏輯和霸權威興趣的人的主要靈感來源了。許多著名學者批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像是 Dani Rodrik 將其稱為超全球化，而 Kari Polanyi Levitt 稱為「金融化」。如 Wolfgang Streeck 所言，當代全球經濟秩序威脅著民主，福利制度，國家主權。替代方案包括了經濟一體化，增加國家能力，重塑民主。

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 (UNCTAD) 最近呼籲新的全球協議，解決此一問題，克服擰節政策的弊端，重新鑲嵌到金融市場，限制經濟力量，特別是金融資本和數位平台，這是自 Granovetter 的開創性工作以來另類經濟學家對經濟社會學的最重要貢獻，因為之前者忽略了宏觀

經濟動態。另外，社會學的觀點也通過對能動，權力的整理解豐富了波蘭尼對經濟的觀點，即「必要的生計組成」。因此鑲嵌的理解被奠基在地域的理解上，有制度的脈絡，制度不會導致統一的資本主義，而是多元資本主義。

超全球化，就我的理解，是一種替代方法，透由下而上的方式去加強民主。波蘭尼強調了超國家的概念，像是地理學家說的，民生經濟是由社區，城市，在地社群組成，民主，課責性，社會保障仍主要在國家邊界內進行。

最後，波蘭尼從根本上來說是其對市場，財產，競爭等制度的批判對後代學者產生了影響與激發批判的靈感。對波蘭尼而言，經濟進步，社會安全，生存法則的辯證關係式被資本主義市場決定的。從長遠來看，隨著 1930 年代自由主義文明的崩潰，經濟至上的社會將會瓦解。生態災難是最好的例子。生物和物理邊界轉化為社會邊界，將掌握資源和被宰制的地方隔離（全球北部與全球南部），不平等嚴重化，威權主義復辟，保守文化抬頭，認同政治的增強，這些也導致了許多保守運動的興起。照波蘭尼所言，個人的自由和責任有著無限可能，無法預測。■

來信寄給 Andreas Novy  
<[Andreas.Novy@wu.ac.at](mailto:Andreas.Novy@wu.ac.at)>

# > 紀念 Ann Barden Denis

Linda Christiansen-Ruffman, Saint Mary's University, Angela Mil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Marilyn Porter, Memorial University, 加拿大



Ann Barden Denis. 來源: USC 加拿大.

Ann Barden Denis 於 2019 年 2 月 5 日突然過世了，享年 73 歲。Ann 畢生奉獻給社會學，跨學科，社會平等，和社會關係。同事，學生，朋友，導師聽聞死訊都悲嘆惋惜，懷念其人性的關懷，還有合作，研究技能，知識高度，以及可信賴的特質。

最近 Ann 開始使用姓 Barden 紀念她的母親家庭，其非常珍視外婆和媽媽在加拿大法裔大家庭傳承下來的智慧與建議。Ann 從這些女性學習到了教育和工作對於女人要維護自己在男人世界中的獨立，是至關重要的。Ann 因為試圖了解周遭的人和社會權力的題，進而發展出了其在社會學中的領導能力。這促使她的女性主義的萌芽與茁壯。Ann 對學術和行動的貢獻良多，也善與人交往，關懷他人，但仍然是一位獨立的女性。

Ann 的過世讓許多其支持者頓然手足無

措，她為加拿大社會學和人類學會（現在稱 CSA）及其女性主義社會學貢獻相當多。ISA 及 RC05（當時是種族，民族和少數族群關係，現在是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原住民和族群）和 RC32（當時是社會女性，現在是女性，性別和社會）；還有加拿大婦女研究所（CRIA-WICREF）。不論在任何職位，以及在她的雙語 Ottawa 大學，Ann 都未曾推辭領導植物（像是會長）和擔任次要職位，就是要確保組織，與社會，學術，實踐的聯繫。她也致力於社會正義，開放社會，包容性等基本原則。此外，她編輯了許多書籍，期刊，特集，新聞。也為相關期刊和學術出版提供了建議。其女性主義和領導才能讓 CSA 和女性主義小組後來茁壯成長。

Ann 還是 ACSALF（相當於 CSAA 的加拿大法語國立機構），加拿大種族協會（CESA-SCEE）

的會員，並且在曾經是「婦女，性別研究，女性主義」小組 (WGSRF) 的成員，我以在法語國家和英語國家都影響深遠，不過並她保留了姓「Denis」的法語發音。從年經開始，她堅持用無聲字母「s」，後來，她和 Quebec 的同事推廣法語和文化。

Ann 於 2011 年在加拿大人文社會科學年會 (CHSS) 上發起了女性主義跨學科會議，從 2013 年起擔任加拿大社會學會的女性主義小組長。共同組織許要管理，其接手並親自把自己的著作譯成法語，以法語國家的參與可以雙語進行。其影響無遠弗界，加拿大社會學會和 CHSS 於是重視雙語。

Ann 的社會學知識和女性主義行政取徑成為 CRIAW-ICREF 的創立原則。CRIAW-ICREF 成立於 1976 年，目的是使女性從事女性研究。2009 年到 2015 年 Ann 成為董事會成員並擔任會長。當時 CRIAW 和其他女權組織搖搖欲墜了，政府裁員的時代中，Ann 幫忙重建 CRIAW 的組織，也重建了志願委員會。她的 CRIAW 重新獲得聯合國身份。作為 CRIAW 在聯合國的代表，組織者，主持人，導師的身份，在聯合國 Ann 的非政府組織女性會議中扮演重要角色，並討論加拿大問題。

1994 年，在 ISA 大會有個例子：RC32 預會議之後我們的小組到達 ISA 辦理登機手續，然後預先定房。但是 ISA 排除了我們中的一位資深亞洲學者。抗議爆發，Ann 介入後，局勢平靜，雙贏戰略於是奏效。隔天早上住房重新來過，讓所有人都可以有得住，說服 ISA 允許。這讓我們去體會非白人參與者設計的帶有門衛設施的「保護房間」。ISA 成員和決策者就像我一樣也對種族主義批判至極。Ann 在此關鍵事件中的行動幫助 ISA 變得更加平等，更加國際化。

Ann 也是一位典範知識分子，著作等身。博士論文《The Changing Role of Students in Relation to the Government of British Universities (1935-1968 年)》發揮了其社會學的想像去處理傳記和權力的歷史結構脈絡。後來研究重心移到加拿大，研究教育，婦女勞動，勞動力，網際網路，女性，階級。種族。有有一次在 1986 年印度舉行的 ISA 會議和英語加勒比海地區可見她的傑出表現。帶領一個國際研究團隊，研究全球化世界中少數民族的不平等，身份認同，網際網絡。

作為 ISA 研究副主席 (2002-06)，Ann 制度化了研究委員會。在再次當選 ISA 後，其合編有《ISA 當代社會學指南：衝突，競爭，合作，與 21 世紀社會學：傳統與復興》。除此之外，Ann 負責 ISA 中的短期和長期社會學研究，以及研究委員會中的複雜議題，例如不民主，語言和地理多元性的缺乏。

Ann 對於加拿大和國際社會學的實踐和發展有不可抹滅的貢獻，特別是女性主義和種族的交織性的方面研究。

她將永遠被懷念。■

來信寄給

Linda Christiansen-Ruffman <[ruffman@smu.ca](mailto:ruffman@smu.ca)>

Angela Miles <[angela.miles@utoronto.ca](mailto:angela.miles@utoronto.ca)>

Marilyn Porter <[mporter2008@gmail.com](mailto:mporter2008@gmail.com)>

# > 遷徙，流動

Karin Scherschel, RheinMai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德國



來源：Nick Youngson  
(創用3).

**遷**移現象來自於是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全球上的資本分配不平等所導致。若全球沒有邊界劃分清楚的民族國家，那就沒有移民問題。國家和超國家決定了現代世界的政治秩序，包括公民權和領土。控制移民進入國家邊界，特別是控制那些庇護，儼然成為新現象，歐洲和美國邊境就是如此，這是兩常被提起討論。

公民身份一方面是現代性的體現，但是也是社會不平等的機制和動力。人們由於不平等於是要遷徙跨越國家，去求學，去工作，或尋找更好的生活條件。然而移民自古以來皆然，

自人類有歷史後，人們移民未曾聽些。Gerda Heck 回顧「想像的歐洲，現實的非洲」一文召喚回來已經遺忘的移民歷史。非洲大陸一直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成千上萬來自歐洲尋求避難，更好生活「避風港」，別忘了這點。

全球今天已成為移民和逃難的動力來源，距離縮短了，移徙人數和國家數量可是史無前例。

移民政策的歷史在是發揮很大作用的因素，資本，商品，資訊，人力的跨國流動是其一，另外還有國際移徙和其他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沒有單一主導模式。遷移過程可能是由經濟，政治，文化，環境因素引起的，像是聯合國難民事務研究員就認為氣候變化會導致難民增加，此外土地爭奪也是遷徙的原因之一。

>>

遷移不是單一事件，反之，其應該被看成是多種因素的交錯關係。國際移徙不僅僅是人們從一個國家移至另一個國家的過程，還是長期的現象，超越時空界限。Carlos Sandoval「中美洲逃難潮：二十一世紀的出埃及記」一文中記載了這樣的現象，因素包括了貧窮，電價不斷上漲，天然氣和汽油價格飆生，導致發洪都拉斯或薩爾瓦多人的逃難人潮。人們成群結隊地遷移並一起跨越國界，不僅可以杜絕綁架或勒索，還有防止暴力，這正式其共同體象徵。

全球化讓跨界容易，經濟流動增加。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造成了移工的巨大需求，移工於移入國經濟扮演重要角色。如 Bediz Yılmaz 關於土耳其的文章所言，這些工作通常是非正式的，現有 360 萬敘利亞人住在土耳其，剝削敘利亞工人是土耳其政府默許的。Yılmaz 的「不自由勞動的難民：土耳其的經驗」總結討論了不自由勞動的剝削。

國際遷徙是一種跨越時空邊界的擴展和展延。多數移民都會有兩種生活方式：移出國家的社會，移入國家的社會。移民在民族國家之外開創了一種象徵性和集體性的共同體模式。多元是現代移民抗爭運動的主軸。移民百百種，有尋求庇護者，有難民，有無照移民，也有專業和勞動移民（包括知識分子，商業精英，家務工作者）。

基於旅行和通訊設施的大幅進步，移民在現代可謂是全球化的現象之一。跨境交流可謂普及化。我在近期訪問意大利 Vercana，有緣和在葉門長大的一位朋友聊天，當時是 Aden 飛彈攻擊的三個禮拜，她回看了家人，寫了關於飢荒和殺戮的故事，也紀錄了飛彈爆炸，新的傳播科技讓不可能成為可能，對不公不義可謂有即時的掌握，對戰爭和迫害也是如此。媒體讓不公不義的現象廣為人知，促進改善生活條件，改善移徙，深化民主。

社會學 Zygmunt Bauman 說的好：「財富全球化，苦難在地化。」人們是否有權利和機會移民是被錢，公民身份，性別所制約的。

在全球的層次上發展運動是和反動有所矛盾的。川普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圍牆是一種激進主義，及歐洲這種作法還受到熱烈歡迎，可見一斑。同時，右派的興起和新型態的侵略性民族主義以及團結主義也展開威脅，人權的全球的擴散招致了保守力量的反撲。Sarah Schilliger 在題為「團結城市的越界」中介紹了團結城市的概念。城市政治空間是民主活的場域，而公民身份不是地位，而應被視為包括就

歸屬和權利之間的協商動態。

關於移民的思索代表著對於不平等和全球化的批判，也是進一步反思歸屬感，權利，以及如何行使權利的議題。■

來信寄給 Karin Scherschel  
<[Karin.Scherschel@hs-rm.de](mailto:Karin.Scherschel@hs-rm.de)>

# > 想像的歐洲和現實的非洲

Gerda Heck,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埃及

2018年10月德國總理 Angela Merkel 在柏林舉行的非洲領導人峰會上提出了10億歐元發展基金項目去試圖解決非洲的失業問題，因為此問題正導致「大批移民」從非洲出走到歐洲。我們會發現有兩個迷思仍然籠罩著此一問題的論述：第一，多數非洲移民是窮人，未受過教育，第二是非洲是移民的宗主國度。很驚訝的是歐洲似乎對於過去殖民非洲的歷史有健忘症。然而殖民主義遺緒和與非洲國家的複雜關係，足足大大影響了歐非移民政策和論述結構。

為了揭露被遺忘的過去，我們來回顧歐洲和非洲的殖民歷史。過去兩百年來，非洲是成千上萬來自歐洲尋求避難以及希望過更好生活的難民和移民的「避風港」。俄羅斯猶太人在十九世紀下半逃離太大屠殺，逃到埃及。希臘和意大利的臨時工則在蘇伊士運河找工作。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來自波蘭，希臘。南斯拉夫的40,000多名難民逃到埃及，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難民營中尋求庇護。也有人去坦尚尼亞，肯亞，烏干達。

## > 管控歐洲移民

21世紀初最普遍的政治問題之一是全球移民。為了應付2015年夏天以及秋天的80萬難民潮，歐盟於2015年11月設立了「歐盟非洲緊急信託基金」(EUTF for Africa)，專款34億歐元用來解決「非

正規

移民問題」(歐洲委員會2017年)。歐盟領導人開始與整個非洲國家進行深入的合作，發展援助與各國的政策，提供新的援助，然後換取限制遷移的回報。

大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1980年代以來歐盟採用了多種方式去加強其移民和簽證政策。他們根據這些國家難民的發生機率去決定需要簽證才能進入申根地區的公民名單。現在某些非洲國家的拒絕率是很高的，像是2014-2017年，德國駐喀麥隆大使館的簽證申請中有45%被發好人卡。

自2000年代初以來邊界控管和遷徙一直是歐盟與非洲鄰國之間的談判議題之一。2004年起，利比亞與意大利達成了協議去阻止利比亞來的移民，這導致將抵達意大利 Lampedusa 島的人會被驅逐回利比亞，被拘留。2008年意大利總理 Silvio Berlusconi 與 Muammar Gaddafi 締結了「友誼夥伴關係合作協議」。利比亞一直被要求為意大利的殖民賠償數十億美元，意大利現在承諾建設和資助利比亞沿海公路，並在20年內每年支付2.5億美元。2011年隨著革命的爆發，北約在利比亞叛亂運動方面的介入，格達費，中止了合作，把遷徙作為對付歐盟的武器之一，而警察部隊仍然忠於他，導致了許多人被逃往歐洲。

2012年4月阿拉伯之春革命之後，

>>

# 「歐洲似乎對於過去殖民非洲的歷史有健忘症，這有強大的後座力。」

意大利和利比亞同意重新開始一起控制移民。2017年2月2日意大利再次同意和利比亞進行軍事合作以控制邊界，為的是「阻止非法移民竄入」。意大利政府從此和歐盟向利比亞海岸警衛隊提供了船，培訓，位的是海上巡邏嚇阻到歐洲的難民和移民，這讓38,000多人被利比亞拘捕和居留。

歐洲和非洲國家之間關於「移民管控，接納，協商，邊境管制，發展，援助，以及簽證的保證和承諾」的網絡2015年逐漸覆蓋了北非，西非和東非。EUTF將重點轉向到非洲大陸，因此新論述浮現成形，試圖去從根源上解決不受管制的跨境遷徙的問題。EUTF資金中的63%用於發展，22%於移民管理，14%於安全與和平。因此大多數EUTF資金都流向了歐洲國家。像是德國實施EUTF的是GIZ，東非也有「更好的移民管控」的計劃，但是該組織因與蘇丹前軍閥的合作而倍受人權組織的批評。

## > 現實非洲

EUTF對非洲大陸的影響尚待研究。不過歐對非洲各國政府施加壓力的作法以確保邊界的安全和驅逐移民的方式可以從殖民統治，剝削，種族主義等角度去看。同時這些法規不是鐵板一塊，非洲政府因此是歐洲政策的犧牲者。從多年的研究中我們發現了控制邊界無法阻止移民。

實際上Asmita Parshotam (2018)顯示非洲是世界上最少遷徙的，多數來自非

洲的移民是非洲內部的移民。2017年非洲有1,940萬非洲內部移民以及500萬外部移民。喀麥隆，查得，剛果，肯亞，蘇丹和烏干達等國接納三分之一的全球難民(490萬)。居住在非洲大陸以外的非洲移民人數從1990年的690萬增加到2017年的1,690萬，不過這些數字和歐洲媒體報導的大規模難民潮八竿子打不著。

還有，並不是所有些移民都在歐洲居住，像是埃及有80%以上的移民居住在沙烏地阿拉伯，約旦，科威特等海灣國家工作。也越來越多人在非洲，拉丁美洲，亞洲，海灣國家之間移民。過去的30年來非洲移民也流向廣州，香港，杜拜，伊斯坦堡。非洲商人的高度流動密切相關導致了此一移民網絡的浮現。不是說歐洲不重要，但是非洲移民的學界論述研究中不用老是把重點放在歐洲。事實上歐洲已經在花很多前去作研究好管理來自非洲的移民，包括歐洲邊界和大陸。哲學家Achille Mbembe對此倡議了無國界的非洲，認為為了回應歐洲在非洲境內進行的移民控制，非洲去非殖民的下一步應包括賦予全體人民的移動性，還有重塑政治和文化的公民權。■

來信寄給 Gerda Heck <[gerda.heck@aucegypt.edu](mailto:gerda.heck@aucegypt.edu)>

## > 中美洲逃難潮

# 21世紀的出埃及記\*

Carlos Sandoval,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國際社會自 2018 年 10 月以來相當關注中美洲人，特別是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逃難潮」隊伍首先穿過瓜地馬拉，墨西哥，然後到美墨邊界的 Tijuana。

**國**際社會自 2018 年 10 月以來相當關注中美洲人，特別是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逃難潮」隊伍首先穿過瓜地馬拉，墨西哥，然後到美墨邊界的 Tijuana。

### > 逃難潮或出埃及？

「逃難潮」(Caravan) 這一用語很值得玩味。西班牙語中和其他語言中的脈絡下，「Caravan」並沒有逃難的意思。「出埃及」則是個歷史詞彙，尤其是與聖經有關，在中美洲脈絡下則意味著移民的被動與被強迫。中美洲人們不是選擇遷移，而是被迫的。此外我要說的是，臨洪都拉斯移民是有在增加的。美國人口普查的資料其實印證了這點。看看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中的中美洲人口就可以比較，發現人數在 10 年中增加了 136%。洪都拉斯移民人口增加了 191%；瓜地馬拉 180%；薩爾瓦多 151%。這裡的不是要講移民人數，因為這已經就知道了，而是做出決定的人數。

### > 如何解釋洪都拉斯移民

遷徙人數不是什麼新的現象，新的是集體遷徙

的這個動作。這種集體行動受時間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該國的電費，天然氣費，油價，食品的成本的上漲則是原因。

集體行動少可以減少綁架和勒索的危險。中美洲國家(哥斯達大黎加除外)的人需要簽證才能進入墨西哥，於是移民要鋌而走險繞過檢查哨，這讓他們容易受到黑道和白道的勒索取迫害。在社群媒體興起讓許多人都可以連結一起，像是如果搭紅眼巴士，路上就可以相互照料。

缺乏就業是可以說是結構性的動機中的決定性因素。其人貧窮人口佔 64.3%，這造成了暴力結構，特別是對於那些沉默的大眾。

政治上，洪都拉斯政變無疑弱化了社會連結與韌性。2019 年 6 月將是政變十週年，2017 年 11 月，Juan Orlando Hernández 在充滿爭議，懷疑，欺詐指控的的選舉中次當選。Hernández 法修改了憲法，允許連任。有諷刺的是，反對連任是 2009 年政變的動機之一啊。

第三是社會因素。洪都拉斯的暴力案件層出不窮。2016 年 San Pedro Sula 是僅次於 Caracas 的最暴力的城市之一，凶殺率是每 10 萬居民有

111 人。

### > 路線和目的地

遷徙的大多數人都走了最長的路線到達美墨邊境，這項旅途更加險惡，但可以理解的是他們要避免沿著墨西哥灣，因為那裡有許多有組織犯罪，像是敲詐、勒索、死亡。洪都拉斯的 San Pedro Sula 和墨西哥的 Tamaulipas (墨西哥灣沿岸) 之間有 2700 公里的距離。然而，大多數移民選擇前往墨西哥太平洋一側的 Tijuana 約有 4,348 公里的距離。

移民當局要求作為所謂「逃難潮」的人在墨西哥當局控制的名單上登記自己的名字。該清單允許移民在美國申請庇護。

美國政府僅批准了 10% 的庇護申請總人數，聯合國難民事務委員會 (UNHCR) 沒有發揮任何領導作用。美國為提供了其 40% 的預算，並且是其最大的金主。

### > 接下來

有三點必須要講。首先是美國 2018 年 11 月 6 日舉行中期選舉，在與墨西哥接壤的四個州中有，八個 (總共九個) 選取選出了民主黨議員。仇外與排外政策沒有給川普什麼優勢。

2018 年 12 月 1 日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就任墨西哥總統。他勢必面臨多重挑戰，非常困難和複雜，其中最棘手的舊是中美洲移民問題。摩洛哥最近在 Marrakech 舉行的移民問題峰會上，墨西哥政府就提議為要為每年 20 萬通過墨西哥的中美洲人提供就業機會。然而，在 2019 年 6 月 López Obrador 卻加強移民管制，好讓川普不執行其對墨西哥出口美國的加關稅政策。

最後有一點也很重要，除了川普連任和墨西哥新總統和立法的新任期，最大的挑戰是要在中美洲保證沒有移民的需要。中長期的目標是去解決該國家的不平等問題，這障礙很難跨越，可是統治階級今天沒有意願這麼做，所以毫無疑問的如何改善以這種不公平和不平等現象必定為中美洲進步思潮和行動的試煉。

BBC 曾應在 2018 年 10 月訪問了兩名洪都拉斯逃往墨西哥的女性，這是不公平和不平等最好印證。其中一位婦女說：「我從來沒有得到美國總統任何幫助，所以他有沒有幫助宏都拉斯這個問題沒什麼意義。」另一位女性受訪者認為，「我們不怕川普的威脅；我們的國家更可怕，所以才遠離家園。」■

來信寄給 Carlos Sandoval <[carlos.sandoval@ucr.ac.cr](mailto:carlos.sandoval@ucr.ac.cr)>

\* 網站 [www.madrimasd.org](http://www.madrimasd.org) 是以西班牙語發表的文章。感謝 Meg Mitchel 從西班牙語翻譯為英語。還要感謝 Torri Lonergan。

# > 難民作為不自的勞動力

## 土耳其的啟示

Bediz Yılmaz, IMIS-University of Osnabrück, 德國, Maya Association-Mersin, 土耳其



2015年，在土耳其南部Mersin的Adanalıoğlu農村地區周圍玩耍的孩子。來源：A.ÖnerKurt。

**有** 360 萬敘利亞人住在土耳其，也有 60 萬他國人住在土耳其。土耳其還是世界上難民人口最多的國家。對於土耳其政府而言這可是一件值得誇口的事，足以成為其他國家效法的模範。

在篇文章我研究中型城市為個案去探討土耳其模式的治理特徵，我主要是參加了移民相關問題的研究和社運。首先，我想解釋難民這個概念。土耳其對於 1951 年《日內瓦公約》的理解是土耳其的敘利亞人是被「臨時保護」的，擁有權利，像是無條件享有醫療和教育，但是不保證其身份的永久有效性。因此這樣的臨時保護政府是任意的、不穩定的、和不安全的，而受限政治動態。我著重在臨時保護的特徵去彰顯一個事實，就是難民雖有福利，但是沒有地位可言。

### > 臨時保護政府的特徵

缺乏地位的保障是居住在土耳其敘利亞人的處境，這解釋了難民國家和難民人口很多的國家之間的鴻溝。我主要聚焦在難民的勞動力，特別是農業難民。土耳其目前依靠難民去補充勞動力的不足，這點毋庸置疑：土耳其 360 萬敘利亞人中雖然有大概一半是勞動人口，可是審查嚴格，只有 31,000 人獲得了工作許可。這導致了難民的工作條件惡劣不穩定。我要強調，非正式工作在土耳其相當普遍了（總佔 50%，農業超過 85%），這是土耳其的經濟剝削模式。換句話說，若是雇主不承認勞動的正規身份，那麼多數敘利亞人將無法活在土耳其。結果是敘利亞人的剝削和以歧視敘已經成為常態。

農業在此一脈絡是特殊的，因為其不用獲得工作許可，難民也被允許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這進一步剝削了難民

>>

勞動力。按照《臨時保護外國人工作許可條例》(2016/8375)第5條第4款，在臨時保護下從事農業和畜牧業工作的外國人不用工作許可也可以工作。按照我在土耳其東部地中海城市 Mersin 的農業區 Adanlıoğlu 的田野，農業的難民勞工象徵了不自由勞動的形式。Nicola Philips 的 2013 年文章有對於不自由勞動的定義，我因此沿用之。

### > 難民是不自由的勞動力

首先，「欠債[...]」通常是由於非正式，口頭，短期合約導致，對工人的規訓，操縱，剝削勞動力。我所觀察的農業地區中勞動力中介機構至關重要，因為其要負責幫敘利亞人翻譯並解決問題，中介人從可分得每天勞動的 10%。既是談判者幫工人找工作，找住宿，談薪水，確保雇主與工人之間任何題。難民的命運被掌控在中介身上。

再者，不自由「主要不是被強迫，而是被禁止的離開；這些條件通常是通過債務或是合約屆滿前扣留工資。」在這些案例中，若產品要在季節結束收到款項，可能會持續六到七個月。那工人或許可獲得一些零用錢，但多數是欠一屁股債。

還有，不自由勞動在當代脈絡下不包括無償勞動，只有交換金錢。但「工資在任何意義上都不等於在這些條件勞動力所增加的價值。」我發現工資低總是低法定最低工資，甚至無償，又不能

跳出合約，因為他們通常有「內錢」要能至少部分取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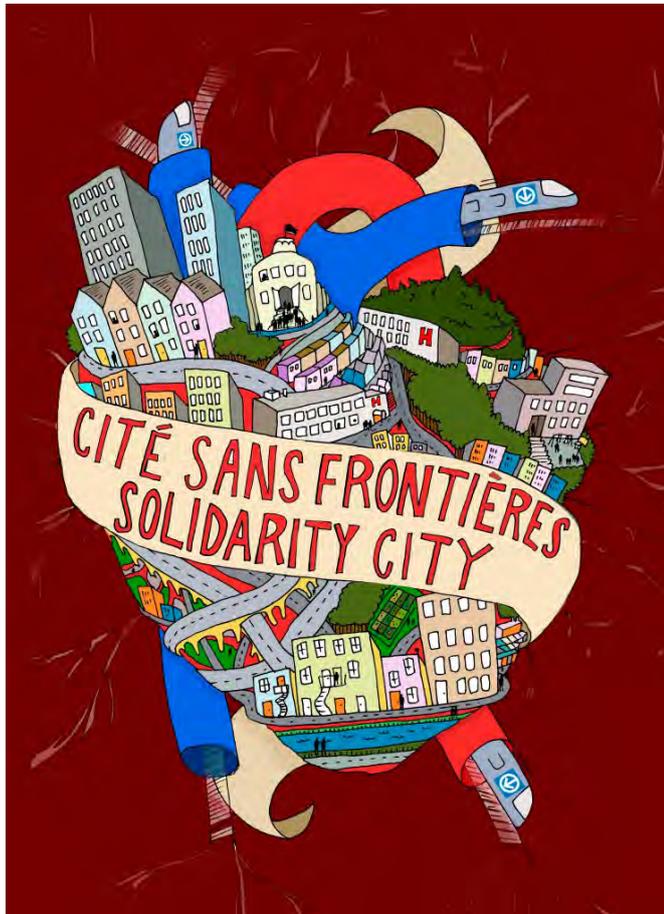
總之自由只有在剝削為前提下才成立得以，也就是「和苛刻，侮辱，危險的工作條件有關，工人沒有勞動全利，沒有人權，被迫工作，讓工人自動自發，任勞任怨。的確難民工人租農田地去搭帳篷中過夜(還要付租金)，沒有基礎設施，只好將電線分支去「非法」使用電力，還要付費，這合理嗎？農業仲介機構根據特定季節決定工作地點，工人總是最後一秒才知道要搬去哪裡。

沒錯，土耳其有大量難民，但是他們並不享有尊嚴的生活，未來黯淡無光。國內和國際政治的作用下導致了這種常態的運行。這種取徑對土耳其人來說不透明，也不永續。如此依賴，土耳其政府如何可能可靠，負責？有可能成為其他國家的模範？■

來信寄給 Bediz Yılmaz <[bedizyilmaz@yahoo.com](mailto:bedizyilmaz@yahoo.com)>

# > 團結城市的去邊界

Sarah Schilliger, University of Basel, 瑞士



全世界的城市已經成為演變成一個關於移民的政治鬥爭場域，同時城市的權利權也扣連上城市民主化。信用：團結城市。

**歐**盟國領導人進一步限制移民，此時地中海來的千上萬人的死亡，那些救助遇難難民的人還被定罪，於是許多歐洲城市宣稱自己是「團結城市」。這樣一來城市演變成一個關於移民的政治鬥爭場域，城市的權利權也扣連上城市民主化。這些爭取「城市公民身份」的鬥爭意味著城市不僅有可能挑戰民族國家的邊界，而且還可以挑戰公民身份的內容。

## > 連結海洋和城市

地方上的主要城市都和對於承諾要成為「庇護城市」有關。意大利沿海城市（例如 Naples, Palermo）和西班牙（Barcelona）的進步派的市長都表示贊成開放其港口給移民，願意提供救援人員。西西里海岸數百人被淹死事件之後，西西里首都 Palermo 市長 Leoluca Orlando 一馬當先宣佈成為「庇護城市」。他說：「如果你問 Palermo 多少難民，我不會說有 60000 或 100,000 人。這裡沒有移民，因為這裡全都是我們的市民。「Palermo 憲章」要求將公民權利與居住地結合。

德國的城市願意為人們提供庇護。像是有數千名公民社會合成的組織（例如「Seebrücke」和「#unteilbar」）支持通過不斷地抗議來整取安全舉措，呼籲建立安全的逃生路線，並將海上救援定為非刑事罪行，人道地接待難民，像是重新安置。

## > 無憂慮沒有基礎設施

自 1980 年代以來北美的團結城市運動的歷史為歐洲的團結城市運動提供了框架與靈感。庇護城市的重點是納入城市的非法居民，因為不論是受教育，就醫，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等，這樣日常活動中都有可能被盤查的危險。無證的人會被遺棄，甚至坐牢，逮捕，驅逐出境。

為了保護城市居民免遭驅逐出境，讓其使用城市基礎設施和享有社會權利，人們已經試著結合社會運動與城市政府，包括一起反對國家當局及其移民政策。「不聞不問」政策（在 Toronto 實施）禁止提供公共服務的城市僱員詢問移民狀況（「不聞」），若知道也不會當爪爬子（「不問」）。某些城市（例如紐約或舊金山），該城市居住的人都擁有市政身份證，該身份證為沒有身份的人們提供了更多安全與保障，使其不匱乏於資源。

團結城市運動的積極分子現在以紐約為例去呼籲在多個德語城市（例如，Ham-

>>



團結跨境移民司法網絡的旗幟。信用：跨境團結城市

burg, Zurich, Bern) 使用城市市民身份證。Bern 市政府已經贊成，可是各界仍有爭議，僵持不下。

### > 去邊界化

市政府在(內部)邊界制度扮演核心角色，那是因為社會福利的定義有賴於城市政府的介入。限制的不穩定讓移徙者的社會權利成為內部監控的一環，地方為非正式移民提供福利正式在挑戰際有的民族國家界線。

公民概念因而被拓展開來：公民不僅被定義為身份，還是對於權利進行爭取和協商的過程。這種看法不太聚焦在法律定義，而是把重點放在社會關係，社會規範，團結實踐，和歸屬感的協商。因此，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公民身份協商的場域，還有城市社區團結象徵與實踐。

移民不是問題，問題在於社會權利和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因此移民的論述歷經質變，變成從當前的「在地化」變成不平等和社會參。這這一來城市鬥爭被扣連到不平等，主要是抵抗精英文化和公共空間的商品化，城市基礎設施的所有權，以及參與民主。

### > 具體的烏托邦

團結城市的動員論述於是透過相似處召喚了具體的烏托邦。這種具體的烏托邦是把移民與社會政策問題扣連起來，而非對立起來。

此外，「團結城市」的概念使社會住宅，城市基礎建設，文化公民權，民主參與，打擊貧困的鬥爭串連起來。城市空具有需求和現實，從此開始夠過原本通常是分開的各種社會運動的日常鬥爭，進而整合，轉譯了底層人民共同經歷的各種形式的剝

削，壓迫，歧視，產生新的認識架構。

這種具體的舉措通常和基層運動為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平台。抗議人士，進步城市，政客，地方政府之間建立連結是重要的。但是城市水準也不準：城市是全球權力結構之一環，民族國家仍然是政治鬥爭的激烈場域。

最後，這個概念也包括重構我們對於所謂歸屬感的社會學理解。這和如何可能成為「他者」是不同的。相反的是，這概念讓我們重新想像「我們」的無限可能。這是對後移民現狀與現實的協商，也是在後移民社會中把移民定調為事實的社會過程。

來信寄給 Sarah Schilliger  
<[sarah.schilliger@unibas.ch](mailto:sarah.schilliger@unibas.ch)>

# > 走向未來的學者： 邁向生態階級政治

Julia Kaiser, University of Leipzig, 德國, Jasper Stange,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德國



Leipzig大學舉辦了氣候變遷運動大會。來源：Julia Kaiser

**世**界於一百年後何去何從？最近的研究指出了全球大多數人口會活在暖化的高溫環境中，讓人類生存至於險境。乾旱將影響全球 30% 以上的陸地，過十億人流離失所。德國物理學家 Harald Lesch 最近論證說人類將被迫要從災難記取教訓。儘管這大家都知道，但是可謂知易行難。

在世界上每個角落，年輕人將憤怒帶到街頭去要求改變氣候的相關具體作為，他們受到 Greta Thunberg 每週罷工的激起鬥志，漏來變成「未來星期五」全球運動 (FFF)。每週的學校罷工，示威遊行，抗議，為的都是制衡政客，要他們遵守《巴黎協定》中規定的 1.5°C 目標。

在德國，抵抗氣候變遷的運動很受歡迎，擁有 250 多個地方分支，也有 55% 的人支持。若搭配學生的興趣，也有「未來科學家」和「未來藝術家」之類的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擴大其社會支持基礎是該運動最重要的戰略目標，若按照此一邏輯，運動規模越大，其對領導者施加的壓力就越大。政黨派別並不是決定因素，並且每個人都要面臨處理氣候危機的後果，所以很多人站了出來。這和過去幾十年來氣候的抵抗運動是很明顯有差別的。FFF 去走向人群、培力大眾，這是可以轉變當前社會結構的。

德國學生於 2019 年初集體加入 FFF，組成未來學生團體 (SFF)。本文認為 SFF 通過確立一種系統性，基於階級的動員組織能夠對氣候

運動的政治產生重大影響。我們要在這簡要總結 SFF 的簡短歷史，然後分析其特色。最後我們提出了一些建議，用意是檢視世界各地的學生和社會科學家如何支持這場運動，好商討應對之計。

## > FFF 征服了大學

隨著「星期五未來」的迅速增長，2019 年春季於德國各地的學生運動者就開始討論如何搭上這股風潮，加入抵抗氣候變遷運動。一開始的目標就是「立即行動！」，這口號喊的響亮，組織許多學生。活動順利進入大學校園：氣候正義的實現於是成為顯學。在短短幾個月內這些政治工作者和學生團體在全國 20 所大學中組織了會員大會，者可是大學多年來舉行的最大規模的集會。我們不禁要問：這種成功如何可能的？

德國東部城市 Leipzig 使用的方法已被許多其他城市效法，因此我們將以此為代表性。為了吸引學生，Leipzig 的運動者用了工會組織的概念。目的是使其他學生參與，並推廣其訴求，加入決定是否支持該大會，於是流傳了一份請願書表達了對 FFF 的聲援，並要求大會討論建立更具可持續性的大學和城市的步驟。運動者和支持者有系統地在所有院系和主校園中傳播請願書，並經常在老師的支持下引進這一請願書。你不會相信，這短短一周內就有 2500 名學生簽名。

大會上的大學和工會的發言人強調生態與社會政治的相互合作之後，學生於是就是有機的成員了。在柏林等其他城市，不僅針對大學，而且針對工會。工會受邀參加「氣候大罷工」並敦促柏林參議院做出具體行動，建立更好的公共運輸系統。

### > 全國的交流與推廣

承襲了在 Leipzig 和柏林等城市所採用的方法，2019年6月其組織了全國 SFF 運動聚會，來自 30 多個城市的代表參加了此次大會，提出動員大學生的方法。美國工會組織者和作家 Jane McAlevey 受邀教給運動者一些組織的小撇步，然後放眼未來。此次聚會是學生氣運動合作的第一大步。夏季學期末，這些運動者在 14 個城市組織了會員大會

同一時間學生開始更加積極地參與與 FFF 發起的工會的對話。德國截至目前為止幾乎每個主要工會都在有和 SFF 和 FFF 運動者接觸。這過去的幾年中工會和社會運動的種合作是很罕見的。工會像是代表公共交通工作者的工會，其利益的交互重疊似乎是抵抗氣候變遷運動的自然盟友。像是 FFF 和其他運動者對話之後，ver.di 服務工作者工會負責人 Frank Bsirske 公開鼓勵 ver.di 成員參加 2019 年 9 月 20 日的全球罷工日。最重要的是即使 IG Metall 這樣的工會代表碳排放密集產業，受到衝擊的影響最大，也和 FFF 交流了，氣候變遷抵抗運動要去解決許多問題，也要與工會實際合作，因為這些合作可帶來大規模的結構變遷，壯大運動，帶來真正的生態與社會永續發展。

### > 新的抵抗氣候變遷運動？

面向未來的學生一路走來有跡可循，可以歸納出一些特徵，合在一起看，其實會發現，雖然不是絕無僅有，但至少也是相當鶴立雞群。

第一，SFF 的目標在於納入更多人近來鬥爭，這和要求參與者接受重大自然和法律風險的其他行動形式有所不動，例如佔領地雷或佔領森林運動。激烈運動形式會自然引來激烈的運動者，也就是 Jane McAlevey 所說的「自我篩選的運動者」。反之，《未來的星期五》是透括納入更廣大社會運動而去進行組織的。

多數決也對這個運動的運作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大學內部 SFF 主要是招攬學生去解決氣候危機的問題，而不是局限於那些本來就參加社會運動包括氣候運動的人口。於是有許多的年輕人投身政治，讓該運動的組織和規模迅速發展起來，那些從未參與過政治活動的人也可以面對群眾侃侃而談，組織示威活動，衝撞前

線。有趣還包括了這一事實：這些積極參與者的大多數是年輕女性。

再者，運動的社會基礎從外部擴展到學校和大學之外時，SFF(以及部分 FFF)至少也實踐中分享「多數」特定於階級的概念。政黨，企業，銀行讓 FFF 有了名聲，獲得對運動的更多支持，歐盟等也被其賦予氣候變化政策的期待。許多 SFF 運動家扮演重要角色，社會運動有工作團隊，專門與工會建立了對話管道，並動員受薪階級。團結之外，實際發揮的經濟議價能力的確確帶來了社會變遷。其對工會的態度不僅是由於對有組織的工人的經濟實力的認可，也是克服的全球氣候抵抗運動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在傳統碳排放高的產業的利益之間的矛盾。右派很會發展這種觀點，對那些直接受到經濟影響的人中特別有效，例如在德國東部前採礦區 Lausitz 就很令人驚訝。雖然基本問題未或解決，但是 SFF 運動家和工會之間對話顯示了全球氣候的利益與公車司機，鋼鐵工人的利益是站在一起的。

### > 展望未來

面向未來的學生，其戰略有二，一是使多數民眾積極參與氣候運動，二是進行組織戰，最終目的是進行結構改革，透過公眾參與去開創永續社會。像是德國將要舉行的全國公共交通部門集體談判，這可以帶來機會給氣候社運者，工會，社區在地組織。衛生和教育部門也是類似，公共交通不僅對氣候變遷很重要，對於整個城市和地區的社會再造和福利也很重要。以此向上，SFF 可以聯合社區和大學團體，團結起來，並相互支援，例如罷工。FFF/ SFF 等社會運動的外部政治壓力也會影響談判，意義深遠。工會若和氣候變遷抵抗運動合作，可以為公共交通從業人員創造更好的工作條件和帶來工資提昇，通過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的擴展和使用改善人民感受，減少碳排放。

社會運動家的「星期五未來」的發起運動中很有影響力，讓政黨，企業，國家氣候變遷危機的解除充滿了信心。不過雖然德國綠黨內迅速散播開來，致使氣候變化議題成為公共辯論達數月之久，可是並沒有帶來德國經濟和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影響。工會與氣候變遷抵抗運動合縱連橫，想樣達到生態和社會轉型，或許這會殺出一條血路吧。

### > 加入我們！

我們認為大學可以在抵抗全球氣候變遷運動中扮演至觀重要的角色。如此一來學生組成的團體和積極動員過程可說很重要，因為解氣候危機的成因和可能解決方案做還需要學者的一起努力，技術不是決定一切，所以技術不能

>>

抵抗氣候變化，而是要經濟和社會進行改造工程，社會科學家因此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要確切呼籲：學生們，起來！起來抵抗氣候變遷！科學家們，起來！起來把研究和務實結合，並且開放你的研究成果！最後，與我們一起起來反抗氣候變遷。這些放眼未來學生熱情地討論氣候罷工的可能。為期一個星期，我們就可以組織起來關於氣候危機及其解決之道的會議。德國校長大會 (HRK) 將大學的角色定義為「民主文化的中心，領導社會的進步與前進。」現在氣候極具變遷中，那此時此刻也正式開創未來的最佳時機。■

來信寄給 Julia Kaiser <[julaidakaiser@gmail.com](mailto:julaidakaiser@gmail.com)>

Jasper Stange <[jasper.stange@hotmail.de](mailto:jasper.stange@hotmail.de)>

# > 塞內加爾的私立天主教教育

Moustapha Tamba, University Cheikh Anta Diop of Dakar, 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的天主教教育在今天仍是主流，因為殖民政府在1816年給教會有開學校的權力，其中像是 Saint Joseph of Cluny 姐妹，Ploërmel 弟兄，聖靈的傳教士，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Castres 修女，和聖母 Mary 的女兒。二次世界大戰後也就是20世紀後半葉，1946年到1960年之間，牧師 Marcel Lefebvre 和 Vicar Apostolic 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另外，Saint Gabriel 弟兄，Sacred Heart 弟兄，Ursuline 姐妹，Saint Charles of Angers 姐妹，Marists 等，也很重要。

教會於1970年將教育責任給了天主教教育國家局，這是塞內加爾1960年獨立後開始的。國家機構在1976年建立了，現在是國家秘書處。私立天主教教育從2003年以來已成為「塞內加爾天主教國家教育部」的一員。

私人天主教教育的權力卻透過教區理事會而分權。在七個教區中，每個教區都有其「天主教教區長」(Direction diocésaine de l'enseignement catholique) 或稱之為 Didec。教區主任管轄其教區中的所有天主教學校。

我們和負責天主教私立教育的機構進行合作，進行研究。我們特別是和 Archdiocese of Dakar 和塞內加爾天主教教育國家辦公室秘書合作收集資料。位於 S.I.C.A.P. 的 Baobab 在聖彼得教堂對面，這對於資料來說很方便。

我們以表格分類排序去顯示我們的資料。

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 Archdiocese of Dakar 佔學校總數快要50%了，成員有第一個包括 Le Plateau, Grand Dakar-Yoff, 和 Les Niayes, 第二個包括 Sine 和 Petite Côte。41個教區組成了天主教學區。

Thiès 和 Ziguinchor 的教區分別佔16%和11%。Kolda 和 Tambacounda 的教區機構則不多。

達喀爾大主教管區名列前茅，佔學生總數的57%。根據 Didec 的統計，城市地區，特別是達喀爾及其郊區，共有25,360名學生接受基礎教育，而農村地區 (Petite-Côte 和 Sine) 則有10,944名學生。在中等教育水平上，大主教管區在2018-19年度的城市和農村地區也分別保持14002名和2465名學生的排名。在中學教育中，大主教管區仍位居第一，佔私立學校總學生人數的75%。聖心堂仍然是最大的私立天主教學校，在2018-19年度共有1,059名學生入學。

Dakar Archdiocese 則宣稱穆斯林學生比天主教信仰的學生還多。像是中學在2018到2019年中有72%穆斯林，26%天主教，2%其他。塞內加爾

表1：2018-19年度天主教學校的學區分佈

教區	等級					
	幼兒園	小學	中學	大學	總數	%
Dakar	58	54	23	14	149	48.5%
Thiès	22	24	3	1	50	16%
Kaolack	12	13	2	1	28	9%
Ziguinchor	11	15	8	1	35	11%
Saint-Louis	8	6	3	1	18	6%
Kolda	6	6	3	1	16	5%
Tambacounda	4	5	1	1	11	4.5%
總和	121	123	43	20	307	100%

來源：塞內加爾天主教國家教育辦公室，2019年3月。

表2：2018-19年度不同教育等級的私立天主教學校學生分佈

教區	等級					
	幼兒園	小學	中學	大學	總數	%
Dakar	6,442	36,304	16,467	6,696	65,909	57%
Ziguinchor	2,268	5,735	1,856	491	10,350	9%
Thiès	1,983	11,080	2,665	836	16,564	14%
Kaolack	1,441	5,326	733	248	7,748	7%
Saint-Louis	970	3,519	1,212	262	5,963	5%
Kolda	656	3,465	958	245	5,324	4.5%
Tambacounda	417	2,630	479	143	3,669	3.5%
總數	14,177	68,059	24,370	8,921	115,527	100%

來源：塞內加爾天主教國家教育辦公室，2019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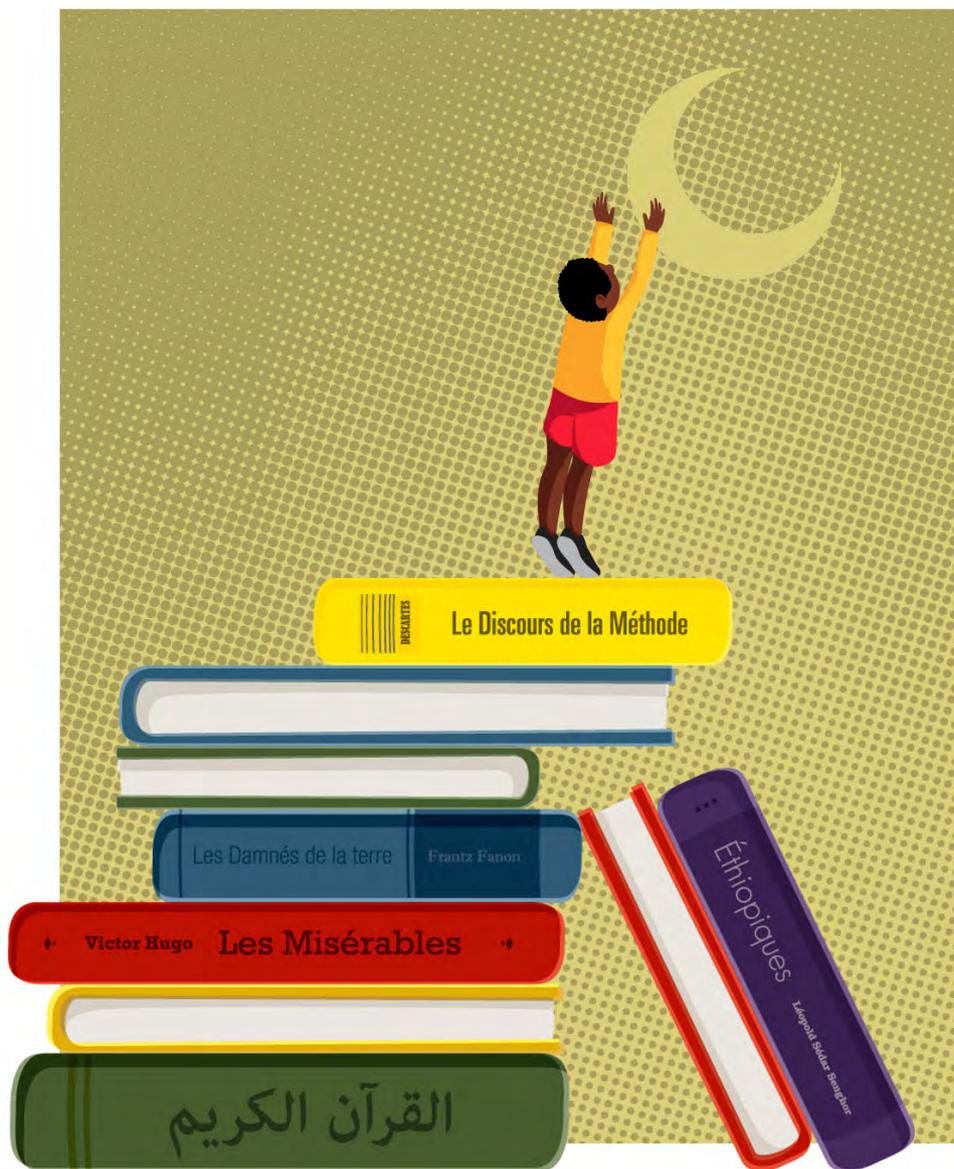
人民由此可知是包容不同宗教的。

言而總之，天主教教育相對世俗教育一直是領頭羊。像是 Saint Louis, Gorée, Dakar, Rufisque 等 19 世紀就有學校。然而多數學生在 Archdiocese of Dakar，包括 Dakar, Petite-Côte, Sine 等，可是現在已經是全國性的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教育機構的數學生多數是穆斯林，而非天主教徒。■

來信寄給 Moustapha Tamba  
<[moustapha.tamba@ucad.edu.sn](mailto:moustapha.tamba@ucad.edu.sn)>

# > 塞內加爾教育系統的社會學考察

Souleymane Gomis, University Cheikh Anta Diop of Dakar, 塞內加爾



Arbu繪圖

**進**行對於塞內加爾的教育制度進行社會學的考察將會是一個很好機會全面盤點的機會。從殖民時代起，賽國的教育體系有各種結構上和功能功能上的優缺點，我們必須繼往開來。值得注意的是，塞國是少數幾個歷史很長的非洲國家。早在與歐洲接觸之前塞國已經黑海伊斯

蘭化時期曾經接觸過可蘭經教育。

幾個歷史和宗教人物像是 El-Hadji Malick Sy, Sheikh Ahmadou Bamba 和 Sheikh Ibra Niass 讓可蘭經教育在塞內加爾及其他地區內擴散。也因為如此，阿拉伯語教育的幫助了抵抗法國的入侵。可是法國殖民者知道如何利用塞國的阿拉伯語教育來建立殖民教育制度。塞內加爾在 1960 年獨立之後仍然保留了法語教育制度，這個從殖民者身上學來的東西後來成為後殖民民族國家建造的資源，這表現在法語被定為官方語言可以清楚看到。

不過人們仍然辯論是否塞內加爾人的教育體系有其自主性，塞內加爾人仍有高度的主體意識。學校雙語教育就是顯然的一例。

## > 賽國教育系統的誕生

第一所非洲的法語學校是於 1817 年在塞內加爾的 Saint Louis 創建的，由 Jean Dard 建立，他是 27 歲的法國教師。從此以後賽國的學校如雨後春筍般逐漸在沿海城鎮和城市蔓延開來，括及到內陸。殖民主義帶來了學校的發展，商業，以及政治上的交流。

和大多數非洲前殖民地一樣的是塞內加爾的教育綱領歷經了法國化，這到了 1960 年獨立後的 1970 年代才開始本土化，1990 年成為民族國家不可或缺得一部分。可是歷經已十年來，塞內加爾的教育體系在結構上和 在功能上效法

>>

法國殖民者體制，也就是 6 至 16 歲的青年享有免費義務教育。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定了每個國家 2% 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標準。塞內加爾目前的人口估計為 1500 萬，那麼應該會有 30 萬名高教生。可是實際人數只有 15 萬，還有，其實其教育綱領和人民的期待有所落差。

### > 優缺點

塞內加爾公立學校制度是成功的典範，在科學，醫學，法律，文學，經濟中皆然。例如文學界的 Léopold Sédar Senghor，歷史和物理學界的 Cheikh Anta Diop。這些人的作品都是歷史的寶藏。教師的培訓品質則是賽國的另一向長處，其決心和毅力必須被肯定。父母參與和投資是另外一個優點，父母會準備學費讓小孩上學。

不過我們必須指出：國家，教師，工會，技術和財務沒有把父母參與學校課程的發展這點納入考量。這樣一來，人口減少，少子化，學生減少。

塞內加爾的教育系統不論在政治，心理，下層建築，計劃，物質，財務，和個體的層

次上都綁手綁腳像是教育政策的制度和就沒有完全自主：受到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的金錢限制。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認識到塞內加爾教育有強制性、但尚未充分融入國民的思維模式，塞內加爾人仍然認為不能自主辦學，因為學校是從法國殖民主義的延伸而已。

在綱領層次上教育的內容與法語課程離型息息相關，儘管有些變化性，但是新課程並未真正反映出當地的文化現實，不過是再生產了殖民主義的慣習。

物質層面上，資源匱乏是塞內加爾教育之度的致命傷。小學到高等教育都是如此。

儘管困難重重，塞內加爾的教育制度仍然是不錯的。■

來信寄給 Souleymane Gomis  
<[Souleymane.gomis@ucad.edu.sn](mailto:Souleymane.gomis@ucad.edu.sn)>

# > 塞內加爾法語阿拉伯學校的策略轉型

El Hadji Malick Sy Camara, Cheikh Anta Diop University of Dakar, 塞內加爾



塞內加爾的小學教育著重於阿拉伯語和法語的識字率。圖片提供：全球教育/flickr。保留部分權利。

**塞**內加爾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家庭說阿拉伯語了，這是由於伊斯蘭教傳入的緣故。該國人口有中95%是穆斯林。受到高度重視的阿拉伯語是該國的特色，這也是可蘭經的語言。對可蘭經熟稔的人通常被看成是高教育程度的穆斯林，只是殖民者並不重視，創建了法語教學的教育體系。

兩種教育制度其實水火不容。只是說為了要滿足人民，法語和阿拉伯的私立和公立學校都提供法語和阿拉伯語雙軌教育。塞內加爾人民是離不開伊斯蘭的，這是跨區域且跨種族的現限，深深影響了人們

本文以文獻回顧方法去解釋為什麼塞內加爾人民可以善加利用法語阿拉伯學校的教育

去反抗殖民者。

## > 法語阿拉伯學校的學習模式

我們發現有兩類法語阿拉伯學校：以伊斯蘭課程（可蘭，fiqh，Sunnah等）為主的，以及以法語與阿拉伯伊斯蘭教育之間的雙軌為主的學校。法語阿拉伯學校如今已有大筆資源投資在學前教育和基礎教育上面了。

首先，第一類法語阿拉伯學校中，前兩年的小學教育著重再阿拉伯語和可蘭經。法語班僅限於介紹字母和對話方式。學生的責任就是盡可能記住很多的可蘭經文。第三年開始學生就要「追趕上」第一，第二，第三年的基礎課程。小學第六年中，學生要參加法語和阿拉伯語考試，獲取兩種語

>>

言的基本畢業資格(阿拉伯伊斯蘭課程畢業證書)。

再來，第二類法語阿拉伯學校是一種雙軌教育。Al Falaq 和 Jamaatou Ibadou Rahmane (JIR) 運動對於法語阿拉伯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因為之前該地是被遺忘的地方，而該地選擇法語作為官方語言。

阿拉伯 - 伊斯蘭教育與世俗公共教育的差異是在於前者主要是去創建和培訓具有深厚根基(伊斯蘭)宗教信仰的未來公民，而且可以在公立學校提供協助。像是 JIR 運動創立的 Bilal Koranic 學校就是這樣的方式辦學。除此之外，JIR 還創建了中學讓該學校原本是要接受 Bilal 學校的畢業生可以在不知道父母意願的情況下上學。在 JIR 的學校中，每個班級的都有兩名老師負責每一門課，法語老師和阿拉伯語老師這佔半邊天。JIR 還為許多機構提供教師培訓課程。El Hadji Omar Tall 學校中的阿拉伯 - 伊斯蘭課程幾乎可以取代世俗公共教育。雖然有些父母贊成阿拉伯 - 伊斯蘭教育，但是這也是一種階層化的排擠效應。像是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更名為 FASTEF) 為阿拉伯語的畢業生提供培訓，所以阿拉伯語教師是和其他老師同等地位的，薪水都相同(Thierno Ka, Alioune Diop 和 Djim Dramé, 2013)。

### > 法語阿拉伯學校：雙語認同

有受過阿拉伯語良好教育的的人是自認的「反精英」，

他們對文化公民權(新形式的公民權)有不同的詮釋，此一觀點被會講法語的穆斯林深受支持(Camara, 2016)。雙重身份賦予了「二等公民身份」的免疫方式，強調是國家公民一員。其主張批判對國家及其世俗制度，但也沒有辦法超越現有制度。但是這穆斯林人口在訴求其公民權和政治權的背後是因為這些人口想促進其「伊斯蘭社會」計劃，挑戰自獨立以來統治塞內加爾的西方化和世俗化的霸權精英的

### > 結論

法語阿拉伯學校現在已經根植在塞內加爾了，特別是在城市中心。被稱為「阿拉伯人」(arabisants) 的阿拉伯伊斯蘭學校的畢業生長期以來就業情況就不好。法語阿拉伯學校在全國考試(BFEM, 學士學位)中的成績領先群雄，創造人才，這將是該國的寶貴資產。大多數在塞內加爾伊斯蘭運動中的這些精英可以用語阿拉伯學校作為認同的手段，翻轉西方的認識論。■

來信寄給 El Hadji Malick Sy Camara  
<[asmalick20031@gmail.com](mailto:asmalick20031@gmail.com)>

註 1：該學校的畢業生現在是高級公務員，有些則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老師。

註 2：Faculté des Sciences et Technologies de l'Éducation et de la Formation.

# > 塞內加爾的世俗私人教育

Samba Diouf, Cheikh Anta Diop University of Dakar, 塞內加爾



**傳**統文化和殖民歷史鑲嵌在全球南方國家的教育體系中。因為教育制度不可能有橫向的移植，歐洲到非洲的影響是混合在地化的。其中的行動者也都有自己的執行策略。這種跨越海洋的教育轉譯是會和當初的理念背道而馳，但是本土化本身就是一種融入和協商的過程 (Charlier, 2002)。殖民者帶來的教育也不是不能被挑戰，「西方」，「法國」，「正式」或「現代」等的形容詞有象徵意義，但是經過本土之後都可以有所變革。傳統教育一直在現代制度中有身影，像是塞內加爾可蘭經學校就一直趕上社會腳步而立足。國立學校則是對傳統教育有所補強，引進了現代化的制度原則。

塞內加爾的解殖民歷史指向了它所預想的一種培育人才的内容和形式。1963年《憲法》規定：「共和國是世俗的，民主的，和社會的。[...] 有教無類[...]。學校應該提供教育，宗教和社區也可以參與。私立學校被須被國家規範，[...] 但是宗教機構和社區不在此一範圍。」塞內加爾世俗共和國因此承認「作為教育手段」的宗教和社區是享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教育控管並不適用於宗教制度。然後1996年，政策往下紮根，教育責任落實到市政和農村社區和後來的州層級。2001年《憲法》明確規定了每個機構的作用。國家「有義務

>>

私立學校在塞內加爾受到家長的歡迎，因為沒有罷工或教師缺乏的問題，這種安定環境讓家長放心許多。圖片來源：Alan Levine / flickr。保留部分權利。

提供公共教育，兒童有上學權利。[...] 無論是公共還是私人教育機構都有責任教育學童，解決文盲的問題，提昇語言識字的能力。」國家的責任再次被確定，且州的地位也增強。

### > 世俗私校

1980 年代，塞內加爾開始有了世俗化的私立學校。個人發起人的世俗的私立學校主要由法起人去管理行政，財務，教育。這和天主教私立學校不同，因為雖然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都是國家教育部的管轄範圍，但是私校不受教會控制。世俗私立學校自 2000 年代以來相當受到許多人們的歡迎。其學生的需求量大，不多也面臨一些實際問題，像是教師的薪水發不出去，薪水過低，房租過期等，所以有些學校只好被迫關門。

### > 父母對世俗私立教育的看法

私立教育在 Dakar 之所以那麼受歡迎的事實可以從私校擴張和學生註冊人數大增的事實中看到。受訪的父母多數指出他們會讓子女去就讀私校的原因是因為安定的環境。這可以在缺工會運動組織的罷工情況中得到印證。另外，還有位受訪者指出：「暴力行為和青少年犯罪案件於公立學校層出不窮，所以導致許多父母寧願選擇私立學校。」像是一位 38

歲的家庭主婦認為：「公立學校的學生若表現不好是因為不用工。但是在私立學校沒有罷工或缺乏師資的問題，並且資源充足，家長貢獻很多。」由此可知家長非常重視私立學校的穩定性，教育品質反而其次。這讓家長都認為私校的小孩一定將來會非常有前途。

世俗私立教育的公眾認知告訴了我們一件事：那就是，選擇私立學校的多數父母為是為了尋求安定的教育環境。這些私立學校很有名，是因為其學生的學業成績有目共睹，不過安定的環境還是父母守選。

來信寄給 Samba Diouf  
<[bathic78@yahoo.fr](mailto:bathic78@yahoo.fr)>

# > 塞內加爾宗教領導的社會人類學考察

Mouhamed Moustapha Dieye, Cheikh Anta Diop University of Dakar, 塞內加爾



在塞內加爾達喀爾的清真寺。圖片提供：Valentina Buj / flickr。保留部分權利。

## > 宗教領導的遺產

**塞**內加爾從最早的時候就是歐洲、非洲和美洲之間交流的軸心，塞內加爾人民的開放程度就是這樣的歷史產物，其熱情、好客，穆斯林和基督教相互包容。其社會文化價值根源於：傳統文化，伊斯蘭教和基督教，西方共和與現代性。其中伊斯蘭教的影響最為巨大，95%的塞內加爾人是穆斯林，大多數屬於正式團體：Tijanyya 兄弟會佔49%，Mouride 佔35%，Qadiriyya 兄弟會佔7%，以及 Layenne 佔5%。

政治宗教歷史在塞內加爾留下深刻影響，其中伊斯蘭教孕育了維持社會和諧的知識分

子和領秀。這些宗教領袖對塞內加爾及其人民影響巨大。例如在 Futa-Toro 的 El Hadj Omar Tall，革命領導人 Samori Toure，Maba Diakhou Bâ 和 Thierno Souleymane Baal，其在 Futa-Toro 的 Torobe 革命反對 Songhai Koly Tenguela 帝國，這是塞內加爾人無可抹滅的集體記憶。這樣的領導融合了伊斯蘭與非洲民主的「舊」傳統，基礎是對權力的批判，對全知全能想法的懷疑與阻止。傳統的非洲社會意識到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因此時常要領導人挺止「扮演領袖」，並避免絕對權力的腐敗。

在 Wolof 社會中國王就職

>>

典禮上，酋長通常發誓要按照傳統行事並為社會繁榮盡心盡力。像是在 Waalo 帝國的著名人士的發言會警告當選的國王：「若你背棄人民，你會被人民唾棄。如果你和糧食作對，選民的之間會激起仇恨。」這種不信任可以在 Wolof 諺語中找到，這也讓國王回想起他對人民的職責：「Buur du mbokk」或比喻為「國王不是人民的父母」。在伊斯蘭教義中我們會看到，從信仰的那一刻開始，人們們就不再依賴他人。伊斯蘭教因此沒有神職人員，人們自己的領導，並尊崇傳統價值的伊斯蘭原則。Futa 的 18 世紀軍閥和穆斯林學者 Thierno Souleymane Baal 瞭解塞內加爾的宗教或公民運動可以如何展開：

「你被建議去遵行以下規則：

- 選擇一個明智，虔誠，誠實的人，他不會為了自己的家庭而貪腐；
- 推翻那些貪腐的伊瑪；
- 確保伊瑪不會世襲；
- 如果其堅持的話，推翻之；
- 民選伊瑪；
- 不要只選同一個部落的人；
- 選賢與能。」

### > 價值觀之於領導的重要

宗教領袖必須正義，無私，誠信，利他。忠於信念，信守承諾，恪守道德。歷史上的兩位宗教領袖就是很好得範例：Serigne Abdou Aziz Sy Dabakh 是 Tidjane 兄弟會第三任領導 (1957-1997 年)，和 Serigne Saliou Mbacké 是第五任。前者告誡到：「如果你看到我背信望義，一定要指出

來，否則我將永遠不會原諒你的怠惰，若必要，你要和我切割。」

在建立共同的願景和道德標準以外，領導者的權力還取決嚴以律己的能力。領導者必須尊重「nit ku baax」(好人)的道德價值觀，這意味著「nit ku am jom」(榮譽感)，「nit ku am Kersa」(專業)，「nit ku jub」(正義)，「nit ku amdiné」(信徒)，「nit ku doylu」(理性)，「nit ku am kadu」(男子的承諾)和「nit kugoré」(有價值的人)。在這些價值觀中，「愉悅」很重要，因為它涵蓋了各種含義：責任，榮譽、尊嚴，努力，犧牲，勇氣，自我意識，意識到自己的價值。Wolof 人會認為領導者必須要背棄「懶惰」，唾棄謊言和不一致的價值觀。

塞內加爾人厭恨背棄承諾的領導。前總統 Abdoulaye Wade 說「Wakh wakheet」(「我收回我說過的話」)，因為其說過不會選第三任，但食言了。現任總統 Macky Sall 也背棄了曾經說過要將任期從七年縮短為五年的承諾，一樣是「Wakh wakheet」。諺語「gor sa waxja」(貴族是尊重說過的話的人)反映了塞內加爾人對信守承諾的重視是如何的嚴肅以對。■

來信寄給 Mouhamed Moustapha Dieye

<[mouhamed.dieye@gmail.com](mailto:mouhamed.dieye@gmail.com)>

# > 讓女性權利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Bengi Sullu, The Graduate Cente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美國 1



50

第六十三屆女性地位委員會會議開幕會議。圖片來源：聯合國婦女署/ flickr。保留部分權利。

**第**六十三屆的女性地位委員會會議 (CSW63) 於 2019 年 3 月 11 日至 22 日在聯合國的紐約總部舉行，主題為是「社會保護，公共服務，永續發展，性別平等，女性兒童賦權」。地方，國家，全球等面向都是討論永續發展的關鍵角度，透過不同事件的討論去改進和保護女性和兒童，落實在社會的經濟，文化，政治的權利。儘管人們對於女性地位的提昇越來越有共識，但是對於女性保護和福利的落實仍然至關重大，。

該委員會主席身兼愛爾蘭的聯合國

>>



第六十三屆女性地位委員會會議全體會議。圖片來源：Africa Renewal / flickr。保留部分權利

大使 Geraldine Byrne Nason，其當天的演講 -- 具有聯合國諮商資格的非政府組織大會上 -- 強調承認女性權利，性別經濟不平等，教育機會取得等議題，希望前方道路越來越光明。若要達到性別平等，在承認女性權利和政策落實中要達到平衡，並且要創新，有系統的，永續，文化等，更要關注女性的政治代表性，以及在公共領域中的教育，經濟，社會參與之間的關聯，奠基於女性的經驗，觀點，立場，知識，做法，以及政策制定，更要體認到種族，階級，民族，宗教，地理，職業等 P.H. Collins 所謂的「交織的結構性壓迫」鑲嵌在社會中導致更種型態的性別歧視。

對於協調政策和為了解決最性別不平等的需要可從以下幾點來切入，對於女性的家暴，公共場所和教育環境中的安全，經濟場域的排除，政治機會的剝奪，以及無常照顧工作，家務分工的不平等。這些議題在 ISA (CSW63) 大會中是討論的核心，圍繞在政策制度相互關聯上，例如教育，兒童，刑事，就業，及居住，交通等，幫助在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場域的女性參與提昇，也強調創新和務實的兼顧。

像是女性遭到家暴就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因為這是私領域範圍，往往被看作是家務事，女性所受到的歧視包括就業機會取得，生活獨立，居住安全，可負擔的托育，諮詢等，但還有更多。

家暴是侵犯女性權利的一種形式，法律無法自動包護女性，還要有效的執法。

另一個問題是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安全。Jackie Sebire 博士在「讓女性可以仰賴司法保護：女性執法的作用」場次中說，照其擔任英國警察局助理首席警長的經驗來說，女性是可以仰賴司法保護的，因為女性問題的敏銳度可以提昇，倡導女性參與警務更可以培力女性，打破既有的父權結構，所以「女性主義觀點的知識」適度亢性別暴力的主要武器，但長久以來並沒有被重視和承認。年輕女性的入學人口增加，讓這議題更加明顯。Natarajan et al (2017) 指出女大學生常常遭到性侵害。所以這樣的看法研究可以幫助制定更好的政策，導入必要的科技和公共服務去促進女性的生活和職場安全。

女性被排除在經濟市場之外的因素不僅是受到暴力的困擾，女性擔的無償照顧和家務勞動限制其勞動力市場的機會，也限制了工作的機會。研究指出「在世界上，女性在無償照顧工作的勞動力參與在時間上是男性的兩倍，甚至到十倍。」(Ferrant et al, 2014)。照顧工作很明顯尚未被政府視為維持經濟和生命的組成，女性也沒有帶薪產假和育兒假，缺乏社會保障，沒有福利，這項女性在生育時面臨離開勞動力市場的難題。如果這些女性想返回職場，大多機會不多或是被降職。「女性重返職場和社會保護」場次討論這種結構性歧視特別影響到有前科的女性，其資料讓她們很難重返勞動力市場。家庭中心的權利保護政策因此至觀重大，因為他們強調在男女家

務分工的平等。對女性權益的保護和利益的增進要有更全面的作法，這是保障法律上的有效性。不同國家的政府必須積極確保女性可以達到上述目的的機制和方法，去保護和培力女性，非政府的組織像是國際社會學會就扮演這樣的角色，教育政策制定者，以便制定更有利於女性的政策。■

來信寄給 Bengi Sullu <[bsullu@gradcenter.cuny.edu](mailto:bsullu@gradcenter.cuny.edu)>

註 1：作者為 ISA 聯合國青年代表，於 2019 年首次參加了第六十三屆女性地位委員會會議。

註 2：小組由國際社會學會，美國犯罪學學會，國際被害人學會，無國界犯罪學家所共同發起。可以聽到 ISA 聯合國代表 [Rosemary Barberet](#) 博士在聯合國上討論 CSW63，有六個場次的影片，照片，書單。這些都是由 ISA 和聯合國共同發展的。

參考文獻：

Ferrant, G., L.M. Pesando and K. Nowacka (2014). “Unpaid care work: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analysis of gender gaps in labour outcomes.”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olicy Brief.

Natajara, M., Schmuhl, M., Sudula, S. & Mandala, M. (2017). “Sexual victim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ublic transport environments: a whole journey approach.” *Crime Preven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 19(3-4): 168–182. (Special Issue: Women’s victimisation and safety in transit environments: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